



内部教学参考

印度革命问题

(印度革命的一些经验教训)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说 明

这几份东西，是试图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探讨印度革命的一些经验教训，即印度革命长期没有起来的主观原因。我们对印度革命问题的研究很粗浅，水平也很有限，印出来作为引玉之砖供讨论和教学参考，希望有关同志阅后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目 录

- 一、从印度共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
看印度革命起不来的根本原因……………李石生 (1)
- 二、星星之火为什么没有能在印度形成燎原之势
——略论印度战后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
教训……………陈峰君 (46)
- 三、依赖“国际领导”、崇信修正主义
“权威”对印度革命的影响……………王朴安 (104)
- 四、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
领导权对印度革命的影响……………陈峰君 (132)

从印度共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 看印度革命起不来的根本原因

李石生

印度过去是英帝国主义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它曾被残酷剥削达两个世纪之久。印度人民有着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都非常重视印度革命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毛主席致印度共总书记的复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印度共产党诞生以来，印度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近半个世纪中，印度曾不断出现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印度人民不断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高潮。如战前一九二一年爆发了莫普拉起义与联合省的农民运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年爆发了吉大港武装起义（一九三〇年四月）、白沙瓦起义（一九三〇年四月）、绍拉普拉起义（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及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各土邦农民反封建起义。战后，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一年爆发了以特仑甘纳为中心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一九六七年又爆发了印度共革命派领导的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

就是在尼赫鲁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也爆发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反夺佃的群众斗争。后来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还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争取土地反对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甚至在纳萨尔巴里运动被镇压后，印度工人、农民、学生和人民群众反饥饿，反物价暴涨，反贪污的斗争仍继续发展。一九七四年五月印度全国铁路工人举行了反对物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坚持了三周。五月十五日印度工人举行了全国大罢工，支持印度全国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次全国大罢工的规模之大是印度独立以来少有的。

这些群众斗争的高潮有力地驳斥了印度修正主义者所谓印度革命“形势尚未成熟”，武装斗争的条件“也不具备”的谬论。它说明：印度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危机正在加深，阶级矛盾正在激化，人民群众必然要进行反抗斗争。印度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与印度共基层党员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不断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尽管有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的镇压与欺骗，以及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印度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共革命派必将总结斗争的经验，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斗争进行下去，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过去的这些斗争尽管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但还没有使印度革命胜利地前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形成一个路线正确、政治思想上成熟和组织上巩固的马列主义政党来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特别是修正主义的领导阻碍了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形成；他们对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出卖，大大推迟了印度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

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1页）“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了从党的路线方面来分析印度革命为什么起来不了。有必要认真总结印度共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是介绍有关印度共（马列）诞生以前印度共产党的路线、组织和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

一、在政治路线上，“左”右摇摆；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印度共历史上主要的错误倾向。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印度共诞生后，由于它的中央领导一直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掌握，因此在政治路线上长期内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革命路线。正如印度共自己说的：党的路线“一直象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极端”。¹

一九二七年前，印度共主要受罗易“形左实右”错误的影响。罗易反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思想，而提出自己的错误主张，后来发展为所谓《非殖民地化》理论。他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促进了殖民地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增长，使印度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因而“在印度占优势的并不是封建制度”。²“以资本主义的矛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印度民族革命已经渡过了资产阶级阶段”。³罗易否认农民是革命力量，反对共产党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不搞反帝统一战线，这实质上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另外，罗易口头上说“必须采取暴力手段”，但他心目中的暴力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恐怖主义，他不是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来进行革命，而是企图依靠改造国大党来“为建立革命的群众政党缔造一个开端。”他主张同时成立合法的工农党与非合法的共产党。但实际上他强调要搞合法的工农党，而没有强调组织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一九二八年后，罗易完全转向右倾，他支持德国布兰德勒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被共产国际开除。一九二七年后，印度共主要受英共的影响。当时英共同罗易一样主张工农党与非合法的共产党同时并存，实际上是把中心工作放在组织合法的工农党上面。这不但妨碍了共产党的建设工作，而且暴露了共产党的组织。印度共机会主义领导在《非殖民地化》理论与忽视农民的革命力量问题上都受罗易的影响。目前，丹吉集团否认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叫嚷印度是一个“独立”的“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⁴这就是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流毒的表现。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约希任印度共总书记达十三年之久，他主要执行右倾改良主义路线。他放弃无产阶级在反帝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追求合法地位，不但不搞武装斗争，甚至放弃阶级斗争。他提出“不要求一党一派的排他性的领导，而要求在甘地指导下的统一领导。”⁵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他又提出“形‘左’实右”的“无产者的道路”的口号，要搞“无产阶级革命”。他断言：“夺取政权是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印度人民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利用战争危机，以求实现民族独立”。⁶民族运动已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武装起义的阶段”。这就是“城乡地区的武装民兵队伍袭击兵营和警察所，捣毁政府机关，对政

府的武装部队进行最大规模的猛烈攻击”。由于当时并没有建立地下组织，除了发动罢工以外，也没有任何武装工作的准备，“遂使党的大多数重要领袖遭到逮捕”，“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⁷ 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约希提出“实现民族团结”，“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放弃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吹捧“国大党是我们的母体，国大党领袖是我们的政治导师”，⁸ 他只强调发展生产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提出“应该坚决防止罢工”，放弃关于土地改革的要求。⁹ 战后，约希又提出“一切为了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口号，吹捧国大党政府是“人民政府”，号召“不要刺激警察”，说什么“为争取合法而斗争”“将决定着党的前途”。¹⁰ 从而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与领导权，丧失了革命的大好时机。

一九四八年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兰那地夫任印度共总书记。他执行的是“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在战略上他宣传革命两个阶段的“交织论”，他说“印度所发生的两个革命阶段的交织与俄国所发生的并不完全相同。它不是二月革命——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¹¹ 他认为印度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可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因此他强调要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在策略上，他主张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他宣称“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在印度也完全适用。”¹² 他企图经过城市工人总罢工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由于他搞冒险主义，结果“损失了大批干部和战士”，“革命的工会组织实际上也瓦解了”。革命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印度共党员由一九四八年时的九万人下降到一九五〇年的二万人。¹³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九五一年五月，拉哲斯瓦尔·拉

奥任总书记。这一时期很短，但党内路线斗争非常激烈。安得拉省委一些同志及一些基层组织主张走中国革命的道路¹⁴但是这一革命路线没有被全党接受。拉·拉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特仑甘纳斗争初期，他表现为右倾；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又表现为“形‘左’实右”，有“速胜论”思想。他“保证”几天或几个星期内要“将武装斗争扩展到全国”，¹⁵而沒有在实践上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在一九五〇年九月英共来信后，拉·拉奥又在党内右派的反扑下向右派投降，主张参加大选。最后，他与右派一起出卖了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走上议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九六二年一月，高士任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共十一年。他表面上似乎执行“中间路线”，实际是右倾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路线。他强调印度是工业发达的殖民地国家，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城市是革命的中心。他认为印度革命既不是走俄国道路也不是走中国道路，“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领导最高形式的农民战争”而是“在一切民主问题上进行政治性活动”。¹⁶他任总书记后，停止了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热衷于参加大选，把党引向议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后，高士便公开推行苏修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一九五七年印度共在喀拉拉邦普选中获胜，组成了邦政府。高士更狂热鼓吹“喀拉拉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灯塔”。¹⁷在一九五八年印度共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上，宣称“印度共产党将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取得充分民主和社会主义”。¹⁸此后，高士追随苏修，同尼赫鲁政府合作，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走越远。

一九六二年一月高士病逝，四月，叛徒丹吉窃取印度共

主席的职务。他推行的是露骨的修正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路线。丹吉更竭力追随苏修鼓吹“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他还充当尼赫鲁政府反华的辩护士与打手，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仆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印度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与丹吉叛徒集团决裂后，改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但印度共（马）中央仍为一些修正主义分子如孙达拉雅、兰那地夫、南布迪里巴德之流所控制。他们打着“中间路线”的幌子，实际仍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口头上“反对修正主义”，表面上不否定武装斗争，实际上以“时机未到来”，

“条件不成熟”为理由反对武装斗争，竭力推行议会主义路线；他们与丹吉集团搞“联合行动”，甚至勾结国大党中央政府出动军警镇压纳萨尔巴里运动，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以上说明：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印度共历史上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它统治的时间较长，危害最大。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口头上都不敢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与武装斗争，但在实质上他们都不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放弃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他们长期追求合法地位，热衷于合法的议会选举，不重视农民工作，不发动农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从而丧失了革命的大好时机，出卖和破坏了印度共产党基层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在思想上他们让甘地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议会主义等思想毒害人民群众；在组织上，他们破坏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统一，导致了党的分裂再分裂。（附注：有关政治路线的主要问题如领导权、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等问题另有专题论述）

尽管印度共中央领导在路线上是错误的，但印度共党内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主要表现在：印度共的广大党员群众和一些基层组织以及个别中上层领导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与印度共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实践的斗争。“印度革命的历史一方面是党员群众从事革命实践的英勇业绩的纪录，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领导人叛卖革命事业的纪录”。¹⁹

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一年以特仑甘纳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斗争就是印度共革命派（主要是当地基层组织与党员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中央的右倾改良主义与“左”倾宗派主义的束缚，领导农民群众开展起来的。安得拉省委在这次斗争中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而正确方面的代表并不是安得拉省委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拉·拉奥、孙达拉雅，巴萨瓦潘奈亚。据安得拉省委当时自己的检讨说：在开始时，省委“为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所支配”，“没有作过适当的建议”；而“沙耶别特地区的同志一开始就领导农业工人和贫农，并组织他们起来斗争。但是安得拉省委的错误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前进”。²⁰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印度共“二大”以后，省委“才首次认识到，特仑甘纳的革命斗争是民主革命的先导”。一九四八年初由于尼赫鲁政府对印度共的进攻与镇压，安得拉省委一些同志与基层组织党员在毛主席的著作与“中国革命文献的帮助下”“认识到这时候必须以特仑甘纳地区的斗争方式来指导安得拉地区的运动”，“必须采取游击战争（中国道路）来反对尼赫鲁政府的军事进攻”。²¹但是当把这个问题与印度的实际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省委“就非常动摇”，²²“惶惑起来”。“许多重要的委员反对

继续进行武装游击斗争。”²³这时，安得拉省委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与斗争。一九五〇年二月安得拉省委书记处自我批评报告指出：“省委书记拉·拉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月在书记处没有开始集体领导期间，代表书记处把一篇名为《警察袭击——我们的任务》的文件散发给全党，他不解决应采取那种抵抗方法的问题，实质是说‘经济危机还未激化’‘人民的高潮情绪还未进发，’书记处其他委员批评了文件的上述错误”。²⁴通过省委内部的斗争，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安得拉省委书记处的决议草案的结论说“我们革命在许多方面与典型的俄国革命是不相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都类似中国革命”。“我们面临应选择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解放斗争的道路”。²⁵当时在省委书记处中只有孙达拉雅公开表示不同意。一九四八年九月，印度联邦军进入海德拉巴邦时，省委书记拉·拉奥竟“带着特别任务离开了省”，直到一九四九年初，省委书记处未开过会来研究对策，因而使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这时，孙达拉雅主张“停止游击战”，“大多数同志批判了这一退却路线”，指出他是“口头上的革命，实际上的改良主义”。当时省委个别领导人和其他委员依靠运动基层大量的支持继续领导特仑甘纳运动，“反对孙达拉雅停止斗争的建议，也严肃批评了巴萨瓦·潘奈亚和哈路曼塔·拉奥提出‘游击战应暂时抑止’的建议”。²⁶在联邦军进入后，游击队撤到森林地区继续斗争并建立了游击战新的据点。

一九五〇年九月英共政治委员会来信批评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六、七月文件“曲解了”《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社论。这时，印度共党内一些右派立即进行反扑，他们攻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是“新”的“盲动的冒险主

义”和“宗派主义”。他们认为这是“过高估计形势的成熟程度和群众的革命性的程度”，他们主张“对大选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²⁷在国内外右派势力的进攻下，以拉·拉奥为首的印度共中央与安得拉省委主要领导人逐步暴露出他们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并向右派投降，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至十月，新改组的印度共中央与安得拉省委不顾印度共基层组织与游击队战士的反对，决定停止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并宣布参加大选，从而出卖了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

这说明：后来，安得拉省委主要领导人拉·拉奥跑到丹吉集团去；孙达拉雅，巴萨瓦潘奈亚成为修正主义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们在一九七二年纪念特仑甘纳斗争时，都发表了一些文章，²⁸一方面彼此争夺这一光荣传统来粉饰自己，另一方面想篡改特仑甘纳斗争的历史经验来为他们现在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但实际上却完全暴露了他们背叛特仑甘纳伟大斗争的真面目。

当时，还有特里普拉邦、迈门辛山区、联合省、阿萨密等地区的基层组织也开展了武装斗争，有的也提出了走“中国道路”的口号。²⁹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新中央委员会给全体党员和同情者的信》中曾承认：“特仑甘纳是在改良主义统治的时期就开始了的。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都作了许多的事情来限制和破坏他们。”“这些地方的同志从生活的经验学习并且为生活的经验所迫，没有理会政治局的宗派主义的文件，迳自前进。”他们“从这两种邪神手中挽救了这些光荣的斗争，这应当归功于这些地方的同志”。³⁰这些评价反映了当时路线斗争的一些真实情况。

当时在特仑甘纳地区领导这一斗争的负责人也证实：

“印度共中央领导对于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的发展，从早期阶段开始以来，一直并无贡献。事实上这个武装斗争一开始就深受领导所采取的错误政策之害。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是在不顾中央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得不到任何具体指导和帮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³¹

一九五三年，印度共基层组织对高士为首的中央热衷于议会选举而放弃对工农群众斗争的领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如旁遮普省委一九五三年八月在《论康格拉县补缺选举的经验教训》的决议中说：“这次组织竞选的方法，表明我们党内有一种严重的偏向正在抬头。这种偏向就是对竞选的工作给予一种不恰当的重视。选举不是被视为斗争的战线之一，而是被视为今天工作中的主要战线。因此我们就从全省各处把负责领导的干部抽调到康格拉县来，结果使我们其他一切活动都瓦解了”。一九五三年七月，阿萨密省委在关于哥哈地补缺选举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在农民当中的有组织的影响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没有能够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农会，引导他们倾向于党”。“我们没有能够在乡村中建立党的组织”。许多地方农民反夺佃的自发斗争由于党不去领导，反而让人民社会党领导去了。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全印农协第十二次大会上，“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两位委员拉哲斯瓦尔·拉奥和 Z·A 艾哈默德都未能作好大会的准备工作”而受到批评。各地方来的农民代表以“激励人心”的战斗情绪对中央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领导方面有这样一个倾向：它把土地改革问题主要看成可以通过议会来解决的问题；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土地改革的唯一保证是农民群众的组织和斗争。”但是基层组织与农民代表的强烈批评并没引起中央修正主义领导的重视。在一九五六年苏修

二十大后，以高士为首的中央领导越来越公开暴露他们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当印度共中央领导从右倾机会主义走向现代修正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道路时，也是基层组织的党员起来进行斗争与造反。如一九五九年在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共中央修正主义领导便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民族沙文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面目。他们迎合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民族扩张主义的需要，表示“无保留地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国防政策”和“战争努力”。³²他们硬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实际上已经划定了”的“印度的边界”，³³并攻击中国军队“越过这条线构成”对印度“领土的侵略”。³⁴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反华反人民。一九六一年一月，安得拉邦印度共理论月刊发表了一位女党员和另一位读者的来信，批评印度共《密拉特决议》的错误主张，他们谴责丹吉十月廿五日的声明是“违背党的纪律”，“是不负责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是追随尼赫鲁的政策”。³⁵一九六三年三月印度共大吉岭地区党员也进行了斗争，坚决反对政府反华。

一九六七年五月爆发的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也是印度共基层组织大吉岭地区党组织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突破了中央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领导农民群众开展起来的。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非常重视党的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

印度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往往是一些基层组织

与党员群众代表着马列主义革命路线同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这是因为基层组织生活在群众的实际斗争中，他们直接接触劳动群众，因此容易在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而印度共的上层领导人不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们脱离劳动群众，脱离斗争实际，就容易接受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奉行错误路线。

二、在思想路线上，不搞马列主义，而搞修正主义；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进行批判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只在口头上承认马列主义，实际上既不承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也不联系实际，而且还歪曲和对抗马列主义革命原则。他们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反马列主义的理论不加以批判斗争。他们追随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而造成党内思想非常混乱，政治上长期存在分歧，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泛滥。

首先，印度共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受甘地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很深。如被称

为印度共“元老”之一的丹吉。在一九一九年加入过国大党。他自己承认曾“作过一个很有名望的国大党领袖(注：即巴特尔)的私人秘书”，³⁶并参加过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一九二一年他写了《甘地对列宁》，实质上吹捧甘地及甘地主义。这本小册子受到孟买一个百万富翁资本家的赏识。就是这个资本家资助丹吉研究马克思主义，帮助他建立图书馆，给他出版书刊。³⁷丹吉于一九二二年混入印度共，长期搞工会工作。在英帝统治时期他曾多次被捕入狱，一九二四年第一次被捕时，就写了变节信给英国殖民当局，表白他愿意为殖民当局效劳。他是一个老工贼，老机会主义者，老叛徒。

阿迪卡利(一九三三年总书记)在印度共二大自我批评中说：“我曾写了一些著作赞扬甘地主义的进步作用”，“我曾把斯大林在六大报告中提到甘地的部分删去，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在战争时期我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民族问题上是一个狂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创始人”。³⁸

约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总书记)在一九四八年自我检查中说：“我在战争期间是一个甘地信徒，在战后时期是一个尼赫鲁信徒。”“我给甘地的那些信说明我比甘地本人更象甘地主义者”。“在政治上我一直没有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主张一条民族改良主义的路线，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党内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辩护士了”。“我的思想根源在于尊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国际方面，将社会民主党观念的影响输进党内来”。³⁹

南布迪里巴德被称为印度共的“理论家”，他曾四次代理总书记，从一大起一直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他在一九三二年参加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曾任国大党全国委员和国大社会党的书记。一九三九年经孙达拉雅介绍加入印度共。

他写了很多文章和著作称颂甘地在民族斗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一书中他尊称甘地为“圣雄”，“国父”，称颂甘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民主事业的战士”，“民族统一事业的殉道者。”他说什么“千百万穷苦农民把甘地当作自己的救世主，当作神的化身”。还说什么甘地“在吸引穷苦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运动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克服民族统一民主运动的主要弱点上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赞扬的”。南布迪里巴德还称颂甘地的忠实信徒和继承者维诺巴·巴维是“鼓吹和推行甘地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大公无私的工作”者。他吹捧巴维的“献地运动是”“甘地的原则”在“解决印度最重要的土地问题”的“真正运用”，是“象任何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所提出的目标一样具有革命性”。最后他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一定祝福巴维及其同事们，竭力帮助他们传播献地运动的理想”。⁴⁰

可见甘地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印度共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影响之深。此外，还有一些领导人受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如穆札德尔·艾哈迈德也是印度共“元老”之一，他一方面承认“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⁴¹另一方面他又傲慢地认为自己是“印度的列宁”。⁴²但他却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强调必须与大伊斯兰主义作斗争的教导忘记了，他竟认为“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的观念”。⁴³

第二，印度共中央领导对甘地主义，尼赫鲁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反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进行批判与斗争。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有错误就得

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共产党几乎同时产生，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仅不仅在政治路线上非常重视领导武装斗争，而且在思想路线上非常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斗争。毛主席从建党初期到现在都非常重视批判反动的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有伟大的五四运动，有几次大的党内整风运动和革命大批判。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与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做了专门的论述，毛主席非常重视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赞扬伟大文学家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些特点在印度都没有。

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不但对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不进行批判和斗争，反而加以吹捧颂扬。印度共总书记高士在《关于党章》一文中说：要保存和发扬我国历史上一切高尚的，人民最喜爱的“合乎人道的东西”。⁴⁴

印度共另一重要领导人 S·G·萨尔德赛曾说：“把甘地主义同新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机已经到来”，“这就是我们必须复兴、发扬光大和加以充实的甘地主义。”⁴⁵

约希在《我的错误》中说：“我因发动一个新的文化复兴运动而骄傲，事实上是无批判地歌颂了封建资产阶级文化传统”。⁴⁶

甘地主义的影响与领导不仅直接使战前的反英斗争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而失败，而且在一九四八年甘地死后，甘地主义的流毒仍是印度革命的最大思想障碍之一。

一九五一年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停止了特仑甘纳农民武

斗争后，甘地主义的继承人巴维立即去特伦甘纳推行“鼓动运动”，他受到南布迪里巴德的吹捧。一九五七年印度共在德拉邦组成政府，巴维就去访问。南布迪里巴德亲自去边境迎接，并与他进行长期密谈，请他在自己的著作上签名留念。⁴⁷

由于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人对甘地主义不进行批判，反而加以吹捧，这就使甘地主义在印度工人、农民群众中以及印度共党内都有很深的流毒。

一九五二年丹吉在《论印度的工会运动》一文中说：“工人和中等阶级雇员由于过去传统的影响，容易赞成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如果这种形式能有助于发动群众，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采用这种形式”。⁴⁸

一九五四年全印农民协会总书记向第十二届年会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号召进行斗争，但不久，这场斗争就变成了非暴力运动”。⁴⁹

一九五五年印度共总书记高士在《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中说：“在加尔各答，各左翼政党也发动了争取粮食的消极抵抗，但是我们认为消极抵抗乃是一种甘地主义的斗争形式，因此……我们都沒有参加。”“这是一个错误，而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此后，几个地方都发展了一种偏向，即把消极抵抗看作主要的斗争形式”。⁵⁰

一九六二年一月，印度工农群众又出现高潮。四月二十日农民群众到尼赫鲁住宅前进行示威，但是丹吉集团把群众运动引向消极抵抗的歧路，搞什么绝食，大请愿，破坏了工农群众的斗争高潮。印度资产阶级报纸说：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现了“印度工业史上最和平的时期。”丹吉还抄袭甘地的非暴力斗争方式，而且把它系统化提出群众斗争的四个阶

段论，即“绝食”，“静坐示威”，“消极抵抗”，“使印度瘫痪”（象征性罢工），并把它当作新经验，加以推广。印度资产阶级报纸在评论丹吉集团进行的绝食斗争说：“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遵从，不如说是对甘地主义的遵从”。⁵¹

另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很深。早在印度共建党初期，对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就发生争论。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印度共康普尔会议上，会议主席辛加腊威卢主张党的名称应是“印度人的共产党”，而不是“印度共产党”。⁵²他们鼓吹民族共产主义，强调这个党是“纯粹印度的组织”，与共产国际无关。一九二七年丹吉在获释时也宣布自己是一个“印度共产党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⁵³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印度共党内的主要表现是：追随和吹捧资产阶级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放弃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在“民族团结”的口召下取消阶级斗争，搞阶级合作与阶级投降。在一九五五年后，印度共中央修正主义领导对尼赫鲁假“社会主义”、“五年计划”，“土地改革”以及民族扩张主义等政策不进行揭露与斗争，反而竭力支持，大肆吹捧。他们吹捧尼赫鲁是“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自由斗争”的英雄，是“全国团结的象征”，⁵⁴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和总司令。”并把“建立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的印度的理想”也寄托在尼赫鲁的身上。⁵⁵在中印边界冲突时，丹吉公开宣称：“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民族主义”，“毫无保留的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并不违背工人阶级运动的原则”。“劳资休战在一种意义上说就是‘阶级合作’，但这是自觉地被接受的。”⁵⁶这就充分地暴露了丹吉集团已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堕落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仆从和尾巴。在尼赫鲁病死时，印度修正主义分子还“哀悼”

说“由于他的离开而造成的空虚是难以弥补的”。⁵⁷

第三，印度共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是追随国际修正主义。

印度共中央历届主要领导人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是追随国际修正主义。

早在印度共建党初期，罗易就公开对抗马克思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评价，而把这次起义说成是一个“反动的运动”。⁵⁸他还对抗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的思想。而贩卖托洛茨基的理论。

约希也“忽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⁵⁹他把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称为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with 理论教育被抛在背后”，“那些作为象征而开办的党校则成了宣传与灌输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组织观念的讲坛”。⁶⁰因而党内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很低。约希在《我的错误》中说：“我们集体的理论水平是这样低”，“阿迪卡利同志曾经把斯大林——毛泽东——约希相提并论，在我们党的讲台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比这更大的漫天大谎了”而“我正是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所描写的那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他们的赞扬使“我的眼睛就看不见我的最大的弱点了”。

“我越来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逐渐用这种原则来教育我自己”，“我犯的错误越来越多”。⁶¹

兰那地夫对马列主义则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来反对它的实质。他宣称：“我们只接受马、恩、列、斯及联共（布）的权威学说，而不接受别的东西”。这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他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并攻击毛泽东思想。一

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社论发表后，他虽作了书面检查，但并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后来作为印度共（马）领导成员之一，他仍然攻击我党我国。

高士对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表面上采取折衷主义，实际上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政策声明》中强调印度的特点，实质是否定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否决基层组织提出走中国道路的革命路线，而走上议会主义道路。在高士任总书记时期，尽管每次代表大会都检查领导“最显著的缺点”，是“在思想战线上未灌输马列主义思想给工人阶级”，⁶²没有重视思想工作”。据一九五三年一月印度共中央的调查，只有二个省有党的教育计划，但也只是学习党纲、党章，或学习党领导人的著作和言论来代替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而大多数省没有任何党的教育计划。⁶³一九五八年印度共特别代表大会仍旧检查“中央与各邦很少注意党的教育工作，新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很低，提高群众工作干部的教育工作也很缺乏”。⁶⁴

由于印度共中央领导长期不重视马列主义教育与思想工作，“没有用马列主义来总结工农运动”的斗争经验，因而对党的历史与政策“没有一致的看法”，“党内一直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⁶⁵

总之，印度共中央修正主义领导在思想战线上不搞马列主义，而是一贯追随国际修正主义“权威”，反对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而最后背叛了印度无产阶级革命，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三、在组织路线上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以宗派斗争代替路线斗争，变无产阶级政党为从事议会选举的工具。

无产阶级政党“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战斗司令部”。因此，它是在阶级斗争中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党的组织原则必须是民主集中制。

印度共成立几十年来，并没有根据马列主义建党原则来建党，因此它一直没有形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它一直没有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统一起来。在党内没有坚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而是不断地进行宗派斗争。由于领导权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使印度共党组织变成了从事议会选举的工具。

第一，从党的领导成分与思想状况来看，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中央领导班子。

印度共运早期的倡导者、活动家和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数属于地富家庭出身，或属于较高的社会等级。他们不是从工农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而是受了英国资产阶级高等教育，随着革命潮流投机到党内来的。

如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马·纳·罗易，出身于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他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恐怖主

义活动。第一次大战期间曾勾结德国人来反英，后流亡美国，接触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又到墨西哥参加了属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后又退出社会党而组织“墨西哥共产党”，以墨共代表资格混入共产国际。

从一九三三年起，历届印度共中央总书记或主席八人（阿迪卡利、约希、兰地那夫、拉·拉奥、高士、南布迪里巴德、丹吉、孙达拉雅）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有的还是博士、硕士、学士。一九六三年印度共中央书记处成员九人中，据已有材料来看，都是非无产阶级出身，其中六人出身地、富家庭或婆罗门，六人受过大学教育。

一九五八年印度共五大组织决议也承认：“我们党的高级委员会基本上仍然是由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组成的，这种情况加深了我们的许多弱点”。⁶⁶约希在二大自我批评中说：我不但是个右倾造良主义者，不但是一个最大的官仔，而且是一个学生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偶然，被投到党的领导机构中来”。⁶⁷这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印度共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状况。

不仅中央主要领导人是这样，就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也大都是这样。据印度共一大（一九四三年）统计，代表一百三十九名中，一半以上是大学毕业生。⁶⁸

印度共五大（一九五八年）的代表中，百分之六十七都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出身，其中百分之七十二受过大学教育。⁶⁹

印度共（马）七大（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代表中，知识分子干部占十分之九，其中五分之三受过大学教育。⁷⁰

印度共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份文件也承认“党的基本弱

点是中央、省以及较小的程度上，下级领导干部，他们的社会出身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经受文化教育和政治锻炼的，县级以下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不少工农家庭出身的……但他们所受的训练，也同其他干部一样，结果彼此在思想意识、组织方法和个人行为上，都没有什么区别”。⁷¹

问题还不在于出身，严重的是印度共中央领导大都是长期脱离工农群众，脱离斗争实践，脱离基层党员群众的议会迷。他们高高在上，热衷于议会选举，当议员，当部长，过着优裕的生活，根本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思想政治上被议会主义所腐蚀而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不但不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甚至破坏或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武装斗争时期，不仅中央领导仍在大城市，不亲自深入农村领导斗争，而且安德拉省委领导人也不“在前线”，不了解具体情况，因而不可能提出具体建议来领导斗争。在联邦军进入海德拉巴邦后，在最紧张的时刻，省委书记竟离开了工作岗位，书记处没有开会研究和采取措施来加强领导，使革命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

一九五五年，在农民进行反夺佃斗争的高潮时，全印农协总书记为了选举离开了岗位，农协办公室关了门，更谈不上去领导斗争⁷²。

一九五九年反对土地税斗争是特仑甘纳斗争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大的一次农民斗争。但印度总书记高士没有和当地农协讨论就在德里用电话下令停止了，因而使斗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一九六〇年中央雇员五十万人大罢工是多年来工人阶级第一次最大行动，使尼赫鲁政府十分紧张，许多地方组织尽

最大努力来支持工人，但党中央没有动员舆论来支持。

一九六三年在孟买百万人大罢工中，丹吉竭力阻止罢工，比社会党还不如，被社会党指责是出卖了工人利益。

一九六七年纳萨尔巴里农民开展了武装斗争，印共(马)农协主席，西孟加拉邦政府土地部长科纳尔竟遵照国大党政政府的意图，同意邦政府派军警去镇压农民斗争。

这些事件说明了印度共中央修正主义领导根本不是领导群众斗争的领袖，而是破坏农民革命的工贼和刽子手。

一九五一年十月印度共中央修正主义领导停止武装斗争后，便热衷于议会选举活动，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一九六三年印度共中央书记处九人中有六人都是现任议员。议会活动严重地影响了印度共的政治路线与思想状况。印度共五大组织决议承认：“我们的实际活动绝大部分局限在参加选举”。议会活动在思想上腐蚀了党的干部，涣散了党的组织生活。

印度国会和各邦议会每年开会时间约为半年，国会议员每月固定薪金是四百——五百卢比，开会期间每天津贴二十一至五十一卢比。还可免费坐头等火车，低价租用房间。

印度共议员原来就与群众联系少，开会期间住在头等旅馆，有仆人侍候，就不愿回原工作地区，甚至把家属都带去，过舒适生活。有些党员一当上议员，下次无论如何都想当议员。连少数原来表现好的工农出身的议员也脱离群众，在政治思想上也变坏了。还有的党员当议员后宁愿被捕入狱，也不愿过地下生活。⁷³正如斯大林同志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说的：他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革命”。（《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72页）

丹吉就是当议员的党员中名声最坏的一个。他把从世界

工联得到的钱自己乱花，他还有个人收入来源。大家都知道他做金融投机生意，他的生活水平很高，有些国大党领袖也不能同他相比。他有汽车两辆，两个人住两套房子，雇了不少佣工，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

印度共领导人之一，曾长期担任过印度共议会党团领袖的 A·K 高普兰在他的一分自传中说：“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足以使人败坏的环境之中。头等的旅行条件，国会中舒适的会议厅，豪华的住宅，免于沉重负担的生活，一切使人生生活过得愉快的环境。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吗？由总理、总统或副总统邀请参加的花园集会和茶会，外国使馆邀请的许多宴会，还有和上流社会的时髦男女交际的场所。另一方面，从社会各阶层而来的人每天来见国会议员，呈交请愿书和备忘录。这样，我们对权势，奢侈生活和自高自大心里的诱惑。……我们特别容易在奢侈生活的突然袭击下垮台”。⁷⁴

有些当议员的党员拿了高薪还不按党的规定交纳党费和捐款。印度共五大组织决议承认：“中央委员会和邦委会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向党的国会议员和邦议员征收捐款。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国会议员没有按时交捐款……若干邦的许多议员也拖欠捐款……这种行动不仅加深了财政困难，而且对全党产生了败坏党风的影响”。⁷⁵

有些当议员或部长的党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在党外也引起了极恶劣的影响。如一九六七年印度共（马）在喀拉拉邦组成联合阵线邦政府，曾与七个党达成协议，要求新部长在节约方面树立榜样，住小房子，乘国产汽车，避免奢侈。但南布迪里巴德政府成员都不执行。南布本人也继续住

大的宅院，所有部长都使用进口的轿车，南布本人还同大垄断资本家比尔拉一起吃饭。

印度共议员甚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遵守党的纪律。议会党团对党的政治路线越来越起着支配地位的作用。

第二、从党内斗争来看，往往拿路线斗争做幌子，不断地搞宗派斗争，找靠山，拉山头，争夺党的领导权。

印度共机会主义领导在党内斗争中，往往拿路线斗争做幌子，在党内进行宗派斗争。他们总是在国际上找靠山，在党内拉山头来争夺党的领导权。他们为了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把议会选举运动中的一套机会主义的作法搬到党内来，进行党内“竞选”，各派采取地区集团平衡政策进行机会主义妥协。有时为了打倒当权的一派，其他各派不管其政治主张有什么不同，也可以结成派别联盟。在矛盾尖锐时，当权的一派往往利用组织纪律来压制对方，排斥异己势力，进行分裂，搞独裁。由于不断进行宗派斗争，使印度共长期来不能成为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印度共党内的宗派斗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建党时开始，直到现在，不但始终没有解决，而且时间之长，派别之复杂，在国际共运中也是少见的。甚至连对印度共成立时间看法也不能统一起来，各派有不同的说法，这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有的怪事。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即印度共运开始阶段，在国外就有罗易和恰多帕达雅两派，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控制在国内共运的权力，在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二五年他们各自派人回国活动，企图把几个分散的小组结合为属他们一派领导的“统一”的共产党。结果罗易获胜了。因此一九二五年在国内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本来就是派系斗争的产

物。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这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彼此之间，特别是孟买小组同加尔各答小组、马德拉斯小组之间进行宗派斗争，没有能够统一起来，而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实际上掌握在孟买小组手中。“当选”的两个总书记都是孟买小组的，其中一个后来证明是英国的特务。⁷⁶

一九二七年，罗易为了多领经费，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印度共产党有几百名党员。但从国内去的反对派报告说实际人数不超过十二人。⁷⁷直到一九三〇年印度共才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而孟买的党组织仍存有在尖锐的宗派斗争。当时兰那地夫派和德什潘德派之间的派别斗争“已成为公开的丑事”。⁷⁸甚至在监狱里也进行斗争，丹吉和阿迪卡利从监狱里控制监狱外的派别斗争；监狱里的“老卫兵”与监狱外的新领导也有矛盾。丹吉就因为在监狱内外进行宗派斗争被开除党籍。由于派别斗争使印度共长期不能成为统一的党，后来共产国际撤销了对印度共的承认。直到一九三三年又重新组成全印的共产党。选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通过政治纲领和党章并再次加入共产国际。但这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一九三四年印度共被宣布为非法，这时党员还只有一百五十人。

一九三五年约希上台任总书记就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参加原来的各派，上台后他得到阿迪卡利等人的拥护而形成新的一派即约希集团。约希在组织上是“遵循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方法，允许派别集团的存在，当权的领导机构巧妙地维护各派别之间的势力均衡，实行形式上的民主来保持对党的控制”。⁷⁹

兰那地夫在三十年代就是一个搞宗派斗争的老手。战后，兰那地夫反对约希的右倾改良主义就是利用路线斗争作幌子来进行派别斗争的例子。

首先，兰那地夫本是约希任总书记时期政治局的成员，是支持约希的右倾改良主义路线的。在一九四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兰那地夫宣称“有条件地支持生产”是一种“左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说，即使工人的生活是“地狱般的”和“难以忍受的”，“也应该坚决防止罢工”。⁸⁰首先起来反对约希的右倾改良主义路线的是特仑甘纳地区基层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后来兰那地夫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情况；一九四七年五月苏联批判了瓦尔加的右倾观点，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强调了武装斗争并提出了“革命交织论”，⁸¹因而兰那地夫便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全会上联合高士，波瓦尼·森等向约希挑战，乘机夺取党的领导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印度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兰那地夫派战胜了约希，夺取了党的领导权。

其次，兰那地夫不是用马列主义革命路线来反对约希的右倾改良主义路线，而是用“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来反对约希的右倾改良主义路线，他并没有认真支持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在组织上兰那地夫也是采取派别斗争的方法，他“遵循资产阶级独裁主义的组织方法”，⁸⁴来镇压党内反对他的人。他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建立个人独裁，不召开中央委员会，以派别活动的罪名清洗了反对他的人。他还修改党章，改组了选举出来的各级党委会。对约希只是在组织上开除，并没有在党内对他的右倾改良主义路线进行思想上大批判。兰那地夫虽然承认自己也有右倾错误但并没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特别对自己后来犯了“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拒绝作深入的自我批评。这说明兰那地夫不是真正进行无产阶级的路线斗争，而是进行宗派斗争。

拉哲斯瓦尔·拉奥在党内展开反对兰那地夫的“左”倾

宗派主义斗争中上台任总书记。但他并没有进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路斗。拉·拉奥本是兰那地夫时期政治局的成员，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他对兰那地夫“左”倾宗派主义的三个有代表性的文件（《论人民民主等》）的通过是有责任的，他是支持兰那地夫的“左”倾路线的。首先起来反对兰那地夫的错误路线的仍是特仑甘纳地区基层组织的农民武装斗争。安德拉省委最初受右倾改良主义路线支配，一九四八年二月后，在基层组织的推动下，通过省委内部的斗争，才决定表示支持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但省委主要领导人仍是动摇的。省委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的决议草案才表示支持基层组织提出的走中国革命的道路，出来反对兰那地夫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而且代表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拉·拉奥。他当时正是受到省委其他同志批评的。他不过是“见风驶舵”。后来在口头上表示同意走“中国道路”。这是由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又发表了社论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时，安德拉省委也积极起来，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与一九五〇年二月发表了一些总结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经验的文章。拉·拉奥就是利用了当时特仑甘纳的斗争与安德拉省委的正确方面和威信而取得了总书记的职位。他担任总书记后，中央领导仍在大城市，没有深入农村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一九五〇年六月新中央委员会给特仑甘纳战士的信中又提出了“速胜论”的观点，对特仑甘纳战士发出空头支票，说几天或几星期内就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斗争来支援他们，实际上拉·拉奥等人躲在城市中，不去领导农村武装斗争，也没有实行任何具体措施去支援特仑甘纳的斗争。因此，拉·拉奥登台后，言论上继承了兰地那

夫的“左”倾。行动上继承了约希的右倾。口头上说的是“中国道路”，实际上走的既不是什么“俄国道路”，也不是什么“中国道路”，而是毫无作为的取消主义道路。

一九五〇年九月，英共来信后，在党内右派的反扑下，拉·拉奥便向右派投降。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的《政策声明》就暴露了拉·拉奥等人的右倾面目，它表面上宣称要坚持特仑甘纳斗争，实际上由于它明确提出“要对大选采取积极态度”，⁸⁵这说明他们已经不可能坚持武装斗争，果然后不久以后他便同右派一起出卖了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代表者。特别是他在一九七二年为纪念特仑甘纳斗争而写的文章《历史性的特仑甘纳的斗争》完全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真面目。他认为联邦军进入海得拉巴后，“继续的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他攻击“党采取了一条”走“中国道路的宗派主义路线”，因而导致了国大政府的镇压。这说明他当时声称“走中国道路”是假，而真实的思想是反对走中国革命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五月高士上台任总书记，他把自己打扮成既反对约希右倾改良主义，又反对兰那地夫的“左”倾宗派主义的正确路线代表。但实践证明高士是在“中间路线”的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分子。高士在一九二九年时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和他的领导人帕加德·辛格一起搞恐怖行动，帕加德·辛格被殖民当局绞死了，高士坐了几年牢被释放，据说他是在狱中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三年时他还把帕加德·辛格说成是印度共的英雄。⁸⁶可见他在恐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并没有划清界限。他颂扬个人恐怖主义，却反对特仑甘纳农民群众性的

武装斗争，可见他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九四七年，高士与兰那地夫一起，反对约希，一九五〇年九月又联合丹吉，卡特等右派支持英共政治委员会对印度共的批评，并配合约希的反扑，来反对兰那地夫与拉·拉奥。高士竭力要取消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并以要同党脱离关系来威胁。⁸⁷他上台后，在组织上重新采取约希的派别集团均衡的政策来维持党在形式上的统一。他在一九五一年恢复了约希的党籍，在一九五六年又把两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约希与兰那地夫重新拉进中央，拉·拉奥在一九五一年下台后，仍一直在中央。这样，以高士为首的党中央就成了各派的大杂烩。尽管高士用所谓“折衷主义”来调和各派的矛盾，但党内思想意识上的混乱与政治上的分歧一直存在不能解决。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领导集团内部在谁是主要敌人与国大党政权的性质等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争论。高士又用“折衷主义”加以调和了。而他们在革命道路等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都同意苏修二十大的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他们的分歧并不是真正的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后来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他们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他们都宣布“支持”尼赫鲁政府“保卫印度领土完整”的国防政策，认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一直是印度的边界”。⁸⁸高士在逝世前，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发表了反华声明，⁸⁹采取了反动民族主义的立场，参加了丹吉、约希等右派的反华大合唱。

一九六二年一月高士病死，党内派别斗争更加尖锐起来。开头，一些所谓“左”派领导人想维持高士时期前期的局面，由一贯以“中间派”著称的南布迪里巴德为总书记。

但丹吉力图争夺党的领导权，要当党的主席，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为了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不惜违反党章，向丹吉让步，增设主席一职由丹吉担任，才成立了一个“混合书记处”。但随着中印边界冲突的加剧，丹吉集团配合国大党政府对印度共革命派和所谓“左”派领导人的大逮捕，乘机改组了印度共中央与地方组织的领导，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进一步推行了修正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路线，公开背叛了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一九六四年，印度共革命派在马列主义革命路线影响下起来造了丹吉集团的反，同丹吉、拉·拉奥、约希集团分裂，这次斗争是必要的，它对揭露丹吉叛徒集团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孙达拉雅、南布迪里巴德、乔蒂·巴苏等只是借印度共革命派反对丹吉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来进行派别斗争。他们企图抓住丹吉的变节信，把丹吉打下去，以便夺取党的领导权。他们并没有在思想路线上与政治路线上同丹吉集团划清界限，并没有坚持马列主义，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反而把思想意识上原则性的论战放下了。这说明他们并不是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而是打着路线斗争的幌子搞派别斗争，争夺党的领导权。而且在分裂前，孙达拉雅派还不断同丹吉集团的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想通过讨价与还价来进行政治交易。但由于丹吉集团抓住领导权不放，最后孙达拉雅才被迫进行分裂。分裂后，在苏修的授意下，两派在竞选问题上不断进行谈判，搞“联合行动”，而且对国外政策的观点也日益接近。在一九六七

年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爆发后，就完全暴露了孙达拉雅、南布之流的“中间路线”实际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

印度共（马列）揭露孙达拉雅、南布迪里巴德一伙修正主义分子在“七大”是“使用巧妙的策略，利用广大普通党员同志对丹吉叛徒的正当忿怒和不满，来为他们自己的一派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我们’打下同修正主义‘决裂的基础’”。

90

第三，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变无产阶级政党为从事议会选举的工具。

马列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是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来发展党的组织，必须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因此，在发展党员时必须根据“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原则，坚持党员的标准。

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并没有坚持这一原则来建党。许多党员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不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而是

附表：印度共产党的党员数目

年份	党员数目	年份	党员数目
1934	150	1948	89263
1942	5000	1950	20000
1943	15563	1852	30000
1944	25000	1953	75000
1945	30000	1956	100000
1946	53000	1958	218532
1947	60000	1961	176000

在合法斗争的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因此一到阶级斗争尖锐与政府镇压时就发生大批党员退党。

印度中央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政策声明》承认：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党的口号被引伸到荒谬的极端去了。党员的标准降低到一个同情者与一个积极分子的标准”。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党员群众，……他们不能忍受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火的锻炼”。⁹¹因此，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受到镇压时，脱党的党员竟达二大时党员的半数。

一九五一年停止武装斗争参加议会选举后，在三大的组织决议中又提出“使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口号，并说“党的进步将不再象过去一样按‘一般政治影响’或甚至仅以特殊问题上群众的动员程度来衡量，而是一般按组织工作的发展，特别是按党的发展来衡量，按书籍报纸的发行量，按基金的征募情况，按群众组织和党本身巩固的程度来衡量”。⁹²

为了适应选举与议会活动，印度共中央常采取降低党员标准来大量发展党员的办法，这给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不纯。印度共中央委员兼马哈拉施特拉邦第一书记萨尔德赛为了增加选票，甚至主张凡是在选举中投印度共票的人都可以加入党。因此许多没有觉悟的人甚至一些坏人也混入了党。而且发展的党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文件上不断提出要在工农中发展党员，但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不愿去农村工作。因此，每次党代表大会都检讨这方面的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

丹吉在“六大”时还虚报孟买地区的党员人数，引起党内争论，后由总书记高士裁决，只承认丹吉所报党员人数的

一半。一九六三年丹吉集团一面大量开除革命派，一面又大搞吸收新党员运动，甚至提出“可以采取新的大胆的作法”。⁹³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密拉特县发生两百人集体入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是脱党十多年，后成为“社会主义统一集团”的领袖；还有一些地方国大党元老与社会党人和工会领袖等。⁹⁴

印共（马）在一九六七年十月马杜赖会议也承认在“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党的运动中降低了党员标准”，“把党的组织降为只适应议会活动的机构，降低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变种”。⁹⁵丹吉集团在“九大”也不得不承认“拉夫式的扩充党员带来了组织上的弱点”。

其次，英帝国主义和国大党政府对印度共采取反革命两手政策对印度共组织的破坏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英帝国主义和国大党政府平时允许印度共参加议会选举，用议会主义来腐蚀印度共，使印度共各级组织与领导都暴露在敌人面前。一旦阶级斗争尖锐时，政府就实行大逮捕来进行镇压。尽管印度共从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进行活动时起就不断遭到镇压，但印度共中央领导从罗易、约希、兰那地夫、拉奥、高士、南布到丹吉、孙达拉雅，都竭力追求合法地位，不进行努力去建立一个能够在非法环境下继续领导革命斗争的秘密党组织。甚至印度修正主义者自己也承认“党内合法主义的观点发展到这样可笑的程度，以致于没有想出或实行一种措施或步骤来保卫党和它的继续存在，使它不致遭受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警察的大逮捕。事实上，党已变成一种无能的工具，它只能在当局大慈大悲‘准许’和‘容忍’时领导这些群众斗争”。⁹⁶

国大党政府继承了英帝的手法，对在什么时候，抓那些

人，不抓那些人，以及什么时候释放什么人等都有一套阴谋计划。一抓一放，其中大有文章；而且在监狱中对政治犯用不同等级的待遇来进行分化，收买立场不稳的党员和干部。由于采取这种拉出去、派进来的反革命策略造成了印度共组织的严重不纯，使党内派别斗争更加复杂。

如在英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就进行了数次大逮捕，一九二三年印度共产主义小组刚开始成立，就发生了“白沙瓦案件”逮捕了当时从国外回印度的一些共产党人。一九二四年又发生了“康普尔案件”，逮捕了各个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丹吉、M 艾哈迈德，乌斯玛尼等。而库拉莫·侯赛因成了告密者，辛加拉威卢后来自首，⁹⁷在法庭上“没有一个被告采取坚强的立场”。⁹⁸而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中央，其中一个总书记是英帝的好细。

一九二九年又发生“密拉特案件”，逮捕了印度共领导干部三十一人。据被捕的斯普拉特说：在监狱一般都“生活得很好”，当局甚至向他们提供违禁的共产主义书笈和报纸，供他们准备答辩，他们还能在狱中成立“等于党的办公室的机构”来指导狱外的宗派斗争。⁹⁹

印度共中上层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被捕数次。如丹吉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被捕时就因“不能忍受的痛苦”而写了给英国总督的变节信。他说：过去“未能理解”孟买市付警察局长同他谈话的“含义”与“暗示”：“你在这里和外国某些人士中具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地位。如果这种地位对政府会有一定用处的话，政府将感到高兴”。而现在理解了，“我被判处了四年苦役徒刑，目的是使对英皇在印度的统治的态度在这几年中能够发生有益的改变”。他“庄重的保证”，“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著作或讲话中对陛下明确地表示

不效忠，而且今后也不打算这样”。“如蒙阁下认为我应当利用这种地位来为阁下的政府和国家效劳的话，我将乐于这样作，只要阁下能答应释放我而给予我这种机会”。¹⁰⁰ 叛徒丹吉这封变节信供认了英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策略，也充分暴露了这个老叛徒的丑恶面目。就连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中央情报局长 C·凯都看透了丹吉的叛徒本质，他说“丹吉不是当革命者的材料”，他只是一个“畏惧”的“小人”，¹⁰¹ “只要做法周到，他可以成为很好的情报来源”。叛徒丹吉就是混进印度共产党中央的内奸与工贼。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孟买监狱的绝食斗争中，丹吉、高士、卡特表现“胆小怕死”，破坏监狱中的斗争，曾受到党内严厉的谴责。一九六三年八月他又破坏孟买百万工人大罢工，被社会党谴责为“出卖工人利益”。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尼赫鲁政府大逮捕时，丹吉成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华走卒，他出国游说，并为大逮捕提供名单。象丹吉这样一个老叛徒、工贼、内奸，直到一九六四年派别斗争尖锐时，才由资产阶级报纸揭露出来。而印度共中央书记处还发表声明为叛徒丹吉辩护。这说明印度共党内的叛徒，变节分子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但是印度共中央从来没有在党内开展清查叛徒、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因而党的领导被一些老机会主义分子，老叛徒，老工贼如丹吉之流所篡夺。

此外，印度共修正主义领导采用资产阶级地方联邦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印度共中央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而是各个派别集团的联盟。有些政治局委员还兼任邦委书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专搞他们本邦的工作”¹⁰² 把本邦的党组织作为自己的山头，而不愿调离。因此，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中

央领导。在中央，往往是总书记或一、二人说了算。中央除了热衷于议会竞选外，不仅对工运，农运不认真进行研究和领导，甚至对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不认真准备，¹⁰³ 代表大会经常不能做出统一的决议，即使做出决议也经常不能贯彻执行。而地方组织邦委会也是“各自为政”。中央与地方联系非常不够，地方组织也很少向中央汇报。

在各级党组织中，专职脱产干部越来越多，形成一批脱离生产，脱离基层党员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机关干部。

“党的日常工作几乎全靠脱产干部”在办公室进行，¹⁰⁴ 这就助长了上级领导的官仔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大部分基层党组织除了搞选举外，长期没有组织活动，这就造成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的状况，由于基层党员群众的主动性被扼杀了，这就使得印度共党组织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组织，而变成了从事议会选举的工具。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强调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

印度革命起来不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虽成立了数十年，但由于在思想路线上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革命路线；由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在政治上，党中央没有积极领导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仔资本的革命斗争；在独立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去发动工人阶级

和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并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是热衷于议会选举，走和平过渡道路；在组织上，没有坚持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因而使党为议会主义所腐蚀，为修正主义所分裂，即使在国际上存在大好的革命形势，在国内存在着人民群众斗争的高潮，但党仍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当然，印度革命长期起来不了也还有客观条件的一些特点与困难，但只要有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有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它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由于印度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危机正在加深，印度革命是必然要起来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印度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和印度共革命派是要革命的。目前，印度人民群众的斗争正在继续发展，印度共革命派正在深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坚信印度共革命派会在革命斗争实践的风浪中得到锻炼，只要在马列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改进错误，加强党的建设，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并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印度革命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印度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

注

1. 新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同情者的信（1950年6月1日）
2. 罗易回忆录
3. 罗易：《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印度群众》1927年第三期
4. 莫希特·森：《什么是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党的生活》1974年第一期

5. 印度共机关刊物《民族阵线》（1939年3月19日）
第96页
6. 《1939年10月印度共政治局决议》，约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信》（1945年版）
7. 扎·瓦·拉奥：《印度共产党成立经过》1943年版
第129页
8. 约希：《国大党与共产党》第2页（1944年）
9. 格利什南：《民族团结保卫祖国》（第66—69页），
1943年S·G·萨尔德赛：《人民取得粮食之道》
（第46页）1943年
10. 约希：《论帝国主义对我党发动的新攻势》（1967
年3月6日）
11. 《论人民民主》决议1949年印度共《共产党人》第
一号
12. 《为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几个战略和策
略问题》（1949年6—7月印度共中央文件）
13. 《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与印度共产党》（1950年5月）
14. 印度共安德拉省委论目前革命形势与斗争形式
（1950年2月）
15. 印度共中央委员会给特仑甘纳战士的贺电（1950年
6月17日）
16. 高士、卡特：评政治局决议案（1950年5月）
17. 《新世纪》1957年3月24日
18. 《印度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32页
19. R·P 萨拉夫：《为什么印度革命不能达到目的》
20. 安德拉省委：《论特仑甘纳抵抗运动的关键问题及
解决途径》（1949年2月）

21. 印度共安德拉省委论目前革命斗争形势与斗争新形式 (1950年2月)
22. 安德拉省委序言 (1950年2月)
23. 同21
24. 安德拉省委书记处自我批评报告 (1950年2月)
25. 安德拉省委书记处的决议草案 (1948年7月)
26. 见《安德拉省委书记处自我批评报告》 (1950年2月)
27. 高士、丹吉、卡特《论党内目前形势》 (1950年9月)
28. 拉哲斯瓦尔·拉奥：《历史性的特伦甘纳斗争》 (1972年10月)
孙达拉雅：《1946——1951年的特伦甘纳人民斗争和右派共产党》自由周报 (1972年10月28日)
巴萨瓦潘奈亚：《是特伦甘纳斗争的教训还是破产了的政治结论》自由周报1972年11月4日
29. 新中央委员会给全体党员和同情者的信 (1950年6月1日)
30. 同29
31. D·V·拉奥：《特伦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的道路》《无产者的道路》1973年9月
32. 丹吉：1962年11月14日给尼赫鲁祝寿的贺信
1962年11月在全印工会大会理事会会议上的报告
33. 印度共全国委员会密拉特会议关于印中关系的决议 (1959年11月14日)
34. 印度共全国委员会关于“中国侵略所引起的国家紧急时期的决议” (1962年11月1日)

35. 安德拉邦印度共理论月刊《桑德萨姆》1962年1月
36. 1963年10月6日《新世纪》丹吉文
37. 阿迪卡利：《印度共的历史文件》第308页
38. 关于政治局组织活动中的“左”倾宗派主义，中央委员会的主要组织任务与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今后正常活动方针的报告（1950年）
39. 约希：《我的错误》（1948年12月18日）
40. 见南布迪里巴德：《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
41. 穆札法尔·阿默德：《关于印度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斗争的回忆》《新世纪》1958年4月号
42. 《对印度共产党党史的新评价》《解放》1968年
43. 同42
44. 高士：《关于党章》《印度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文件选集》（第77页）
45. S·G·萨尔德赛文，《民族阵线》1939年4月号
46. 约希：《我的错误》
47. 马德拉斯《印度教每周评论》1957年4月29日
48. 丹吉：《论印度的工会运动》1952年版第56页
49. 《全印农民协会总书记向全印农协第十二届年会作的报告》1954年版第37页
50. 《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155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版
51. 印度经济时报 1964年3月24日
52. 《对印度共产党党史的新评价》《解放》1968年3月
53. 同上
54. 丹吉1962年11月16日在全印工会大会理事会会议上

- 的报告《工会记录》1962年12月5日
55. 丹吉1962年11月14日给尼赫鲁祝寿的贺信
 56. 同 54
 57. 关于哀悼尼赫鲁的决议1964年5月29日
 58. 《对印度共产党党史的新评价》《解放》1968年3月
 59. 《关于印度共产党党内左倾偏向的报告》1950年5月
 60. 《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与印度共产党》1950年11月1日
 61. 约希：《我的错误》1948年12月18日
 62. 高士：我们的一些主要缺点（1952年11月）
 63. 政治局：印共各省目前组织情况（1953年1月）
 64. 印度共中央向特别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新世纪》1958年4月
 65. 印度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组织的决议》1958年4月
 66. 同上
 67. 中央委员会关于约希反对开除党籍的申诉的决议1950年6月5日
 68. 《人民战争》1943年6月
 69. 《新世纪》1958年4月27日
 70. 印度共产党(马)七大宣言
 71. 南布迪里巴德论印共党内危机及其解决办法
 72. 全印农协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
 73. 《新地》周刊1973年1月27日《安德拉邦：对一次分裂的分析》

74. 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4年3—4月号第59页
75. 《印度共特别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24页
76. S·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77. 同上
78. 《对印度共产党党史的新评价》《解放》1968年3月
79. 同 38
80. 兰那地夫：《工人阶级与国防》1943年
81. 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党为全国各族人民独立，为人民政权，为经济复兴及其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情形1947年9月
82. 勃腊波特·占德腊：《论〈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83. 同上
84. 同 38
85. 同 60
86. 高士：《帕加德·辛格和他的同志们》1946年
巴耳·塔古尔：《帕加德·辛格和他的思想》1953年
87. D·文卡特斯瓦·拉奥《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的道路》《无产者道路》1973年9月
88. 印度共全国委员会密拉特会议关于印中关系的决议（1959年11月14日）
89. 人民日报1961年12月7日
90. 印度《解放》月刊1968年7月号编辑部按语
91. 《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与印度共产党》1950年11月1日

92. 《印度共产党政治决议》（1953年12月印度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93. 《新世纪》1963年3月10日
94. 《新世纪》1962年6月24日
95. 印度共(马)《关于党的组织任务》决议1967年10月马杜赖会议通过
96. 《印共(马)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1968年12月
97. 穆·艾哈迈德：《关于印度共产党的成立及初期斗争的回忆》1958年4月
98. 《对印度共产党党史的新评价》《解放》1968年
99. 斯普拉特：《炸毁印度》
100. 见印度《思潮》周刊1964年3月7日
101. 印度《爱国者》周报1964年5月1日
102. 印度共中央向特别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新世纪》1958年5月
103. 《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141页
104. 《印度共产党特别大会文件选辑》第23页

(写于1974年)

星星之火为什么没有能在 印度形成燎原之势

——略论印度战后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陈峰君

一、一个重大的课题

众所周知，印度革命在当今世界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印度的人口在世界仅仅次于我国，现在已达六亿一千多万，大约相当于我国五十年代末的数字¹。这六亿多人口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十二个英国或三百个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它也意味着一个半第一世界或一个半第二世界的人口，如果再过十年，它可能要等于一、二两个世界人口的总和，而和我国现在的人口相仿。因此，印度人民革命的进程和前途不仅直接关系到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的伟大斗争，而且也关系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实现。列宁在逝世前不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绝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²。列宁在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世界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地位。

印度早在二百年前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被称为英王皇冠上最明亮而珍贵

的一颗宝石。当英国在一九四七年将印度的政权转让给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后，美苏两霸相继进入印度，把它视为争霸亚洲餐桌上的最大的一块肥肉。灾难深重的印度人民长期以来在黑暗中痛苦挣扎摸索、英勇奋战，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印度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³。二十年代初在十月革命影响和鼓舞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印度传播，印度共产党也开始建立。这种过程与时间几乎同我国是一致的。

革命导师无不对印度革命寄予莫大希望。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分析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恶果后预言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名著中也曾作过预言：“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⁵。

但是，马克思的预言已过去一百二十五年了，列宁斯大林的预言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印度至今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印度人民仍处在极度的贫困之中，今日之印度与昨日之旧中国很多地方相似。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复兴起来，为什么印度革命长期起不来，或者起而复落，兴而复衰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这个当代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课题以极大的鲜明性和迫切性摆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进行系统地研究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熟悉印度革命历史的都知道，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直为大资产阶级所窃取，而印度共产党自一九二〇年成立至今半个多世纪里，其领导权则一直为党内修正主义分子

所窃取。尽管党的领导人更迭多次，但他们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却一直在党内占政治地位。这就是，一九二〇——一九三四年的罗易路线，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七年的约希路线，一九四八——一九五〇年的兰纳地夫路线，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的拉奥路线，一九五一——一九六四年的高士路线，一九六四至今的印度共两个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正是这条又粗又黑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造成印度革命长期停滞不前。长期以来，印度共产党广大基层革命派曾同修正主义领导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曾在一九四六——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七——一九七二年，两次冲破修正主义的罗网领导了著名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但是，即使在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中仅有的这两次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为期不长的武装斗争，也遭到修正主义领导的严重干扰、破坏以至出卖而失败，（第二次武装斗争还由于革命派主观方面原因）这就更加说明印度修正主义给印度革命带来的极大危害。

近几年，世界不少国家的学者，包括印度的学者，对这一重大课题都异常关切，正在进行深入探讨，而且写了一些论文和著作。他们除了从印度的社会性质、特点、印度共产党的历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外，还着重从印度战后初期的特仑甘纳和六十年代后期的纳萨尔巴里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进行研究，试图从中找出印度革命长期停滞的答案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印度国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同修正主义的两个集团之间正在围绕着战后的这两次武装斗争展开了印度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其核心是两次武装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经验教训。两个修正主义集团从各自的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把两次武装斗争的失败

归结为印度革命“特殊论”“条件未成熟论”，肆意诋毁歪曲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伟大意义，为他们叛卖印度人民革命的罪行开脱辩解。因而，剖析、研究战后印度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了解印度革命长期起来不了的症结所在，对于批判印度修正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特仑甘纳武装斗争三起三落与四次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是印度人民民族民主革命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武装斗争道路同议会主义道路，革命派共产党员同修正主义上层领导在印度的第一次严重的较量。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不但遭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并且也遭到印度共产党内四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次又一次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最后终于为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所葬送。

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十月，前后经历了艰苦卓绝、曲折复杂的五年多战斗历程，大体上分三个小的阶段：（1）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底。（2）一九四八年初至一九四九年底。（3）一九五〇初年至一九五一年十月。

武装斗争从爆发到第一次受挫 与约希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特仑甘纳位于印度的东南部，原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

土邦海德拉巴邦东部的一个地区，现在属于安德拉邦，面积大约四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千多万。

这次武装斗争之所以爆发，决非偶然。它是印度农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印度独立前，英帝为了掠夺，扶持了印度封建地主阶级，广大农民在地租、赋税和高利贷的重重压榨下，生活极其悲惨，呈现出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绝大多数人口“几乎在生存的边缘上苟延残喘”，“印度的大多数居民从来不知道吃饱是怎么回事”，⁶这就不能不使印度农民起来不断为争取土地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据英国学者凯恩林·高夫的统计，自英帝入侵印度后，印度爆发了七十七次农民起义，其中几万人者三十次，几十万者十二次⁷。几乎平均不到三年就爆发一次农民起义。

印度的土邦“是英国暴政的奴役性十足的工具”，“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英国政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⁸。这里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海德拉巴邦是土邦中最大的一个。该邦的绝大部分土地为王公、贵族、庄园主、高利贷地主所占有。尼萨姆土王一人就占海德拉巴县的全部土地。许多大地主拥有上万英亩甚至十几万英亩的土地，而将近一半农民则完全没有土地。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异常残酷，该邦盛行高利贷的那古制度的利率竟达200—300%。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连尼萨姆政府都不得不发出命令，取消征收八十五种的非法的苛税。⁹土邦人民完全处于专制的暴政之下，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政治。王公贵族拥有司法、税收、民事和刑法等特权。尼萨姆王朝还严禁其他地方人进入土邦。土邦的人民被囚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大监狱之中。¹⁰特仑甘纳人民不仅受英帝和它支持下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也深受英帝支持下尼扎姆回教统治阶

级的民族压迫。安德拉人被分割在海德拉巴东部的特仑甘纳地区和马德拉斯的北部。他们迫切要求把安德拉人们居住的地域合并起来。

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是在二次大战后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下爆发的。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浪潮，东南亚人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进程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鼓舞了特仑甘纳人民。在国内，印度各阶层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英的革命风暴，如声势浩大的海军起义等等。同时印度广大农村也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封建浪潮。仅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四七年下半年就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则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

特仑甘纳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三十年代，特仑甘纳农民就曾自发地举行暴动反对统治者的强迫劳役和苛税。在四十年代初期，在印共基层革命派领导下，农民开展了反土地税和反夺佃的斗争。特仑甘纳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和党员曾深入农村，支持、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印共领导下的要求实行民族自决的群众组织和统一战线组织安德拉大会到起义时已发展到十万人。而且在纳尔冈达县还组织了人民志望队的农民武装，抗击地主恶棍的攻击。这就为特仑甘纳武装起义作好了组织上和武装上的准备。

武装起义最先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在该区的纳尔冈达县爆发，直接的导火线是该县卡达文迪村的一个恶霸地主纵容手下爪牙开枪打死了安德拉大会的工作人员科马拉亚，烈士的牺牲燃起了多年来积压在农民心头的阶级仇恨的怒火。印共纳尔冈达县委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农民揭竿而起，他们高举红旗，手持投石器、棍棒、夺取恶棍的枪枝，赶跑了地

主恶霸，从此便揭开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序幕。不久，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到周围数百个村庄，在这些村庄里成立了志愿队，选举了村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人民法庭。在纳尔冈达县委关于“全部没收地主非法占有土地”的口号下，农民废止了强迫劳役和苛捐杂税。在部分村庄分配了土地，人民革命的情绪极为高涨。当时土邦尼扎姆王朝为了扑灭正在蔓延的革命烈火，便派出大批军警和军队实行血腥屠杀和大打。在反动王朝军队的疯狂镇压下，农民武装不得不暂时退却，部分转入地下。刚刚起来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到四六年底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被镇压了下去，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在被镇压后的一年，部分地区农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坚持斗争，但整个说来，斗争处于低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1）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是一个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它不是单纯的农民反封建斗争，除了土地要求以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要求。民族要求不局限于安德拉民族自决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英帝国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要求。（2）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3）起义是在印度共基层革命派领导下发动起来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既分配了土地又建立了革命政权，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起义规模尚不大，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敌人镇压下去。从领导起义的革命派方面说，与他们缺乏经验，对“组织游击战争反对武装警察和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党内投降主义斗争不利等因素是有关系的。¹¹

但是，导致武装斗争第一次受挫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印度共中央及安德拉省委主要负责人约希、拉奥、孙达拉雅所推行

的投降主义、合法主义线路所造成。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是印度反帝反封建斗争空前高涨、迅猛发展的两年、也是英帝与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互相狼狈为奸密切配合共同对抗印度革命斗争的二年。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不仅动摇着英帝和土邦王朝的基础，而且超出了大资产阶级利益所许可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英帝同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彼此都急于谋求妥协。一九四六年九月，在英帝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该政府成立后不久就与英帝共同策划反对工农群众斗争，并且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随着一系列的谈判，代表印度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于一九四七年六月接受了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同年8月印度宣告独立，英帝正式将政治权转让给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上台后，则进一步同英帝和封建王公紧密勾结，同年十一月，与尼扎姆王朝签订了所谓“维持现状协定”¹²，并提供王朝以武器，共同镇压特伦甘纳革命人民。大量事实说明，独立前后英帝、封建王公、买办资产阶级都是印度革命人民的凶恶的敌人。

这种客观形势，要求有一个真正代表印度广大人民利益，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深入农村，领导特伦甘纳等地的农民武装斗争，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印度共在约希领导下，走的却不是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而是合法主义、议会主义的“和平道路”。他们一不反英、反而支持蒙巴顿方案；二不敢同大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甚至认敌为友，声称“全心全意地拥护”尼赫鲁政府¹³；三压制阻挠特伦甘纳武装斗争。

一九四六年八月，印度共中央通过《政治决议》，只字不提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反而把“建立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制宪会议”作为党的中心口号，¹⁴其后印度共中央指出在海德拉巴邦只能提“反对强迫劳役、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夺佃”，而不能提“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甚而指示特仑甘纳志愿队不许使用土枪，怕这样做“会产生全印范围的反响”等等。这就是说，约希只许搞合法斗争，不许搞武装斗争。对约希的这种投降的合法主义线路，连孙达拉雅现在都不得不承认：由于“在是否允许我们干部夺取和使用土枪的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因而招致了全国的混乱并破坏了第一次的斗争高潮”¹⁵。

印度共安德拉省委¹⁶的主要负责人拉奥、孙达拉雅等人在特仑甘斗争初期也是忠实地执行约希路线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他们积极参加邦议会选举。省委提出了三十五名候选人参加选举，并以选举结果仅次于国大党而沾沾自喜。四七年一月，当国大党以安得拉地区为重点对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实行大搜捕时，省委仍不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所谓“合法斗争”，并宣称安德拉的党“并不象国大党政府所诽谤的那样，准备用暴力推翻政府，也没有纵容任何形式的暴力”¹⁷。纳尔冈达县农民起义爆发后，省委领导人表面上采取不闻不问，冷眼相看，而在实际上则是狂热追随约希将其纳入合法主义轨道。在尼赫鲁政府与尼扎姆签订了“维持现状协议”以后，他们在海德拉巴邦提出所谓“团结国大党，反对尼扎姆”的投降主义口号，实际上是一切依靠国大党一切服从国大党。为了团结国大党，竟然在农村“依赖那些异己的阶级，即富农、高利贷地主和一般地主”¹⁸，为了迎合国大党，则放弃了原来提出的“废除海德拉巴、成立大安得拉”

的主张；为争取反尼扎姆的大地主，竟将土地纲领的标准由二百英亩的最高限额，增加到五百英亩；甚至为了反尼扎姆，党内竟有人发出要求印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以便“解放”土邦，有的还卷起红旗而扛起国大党的齿轮旗¹⁹。安得拉省委过后承认“第一次斗争高潮遭到镇压和转入低潮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及时提出土地问题和拿起武器，虽然人民在这方面曾坚持他们的要求”²⁰。

尼扎姆反动王朝军队能够较迅速镇压方兴的武装起义并使运动停滞一年之久，正是通过约希、拉奥等人的这一套合法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而起作用的。

武装斗争从高潮到第二次受挫与 兰纳地夫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武装斗争经过了近一年的低落以后，从一九四七年底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一年年初到同年九月是武装斗争的高潮时期，其特征是：

（一）斗争是在基层党组织和农民群众坚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运动处于低潮时，具有光荣传统的特仑甘纳农民迫切要求重新拿起武器、获得土地、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土邦的统治。因此，在原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又自动地组织了村民兵队伍，收集土枪、长矛、刀子武装自己，甚至巧妙地 from 军警手中夺取枪枝，实行武装抵抗。这本身就是对约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强烈抗议和有力批判。恰恰在这个时候，约希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印共中央全会前后及会上遭到了批判。在特仑甘纳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推动下和约希路线受到批判的情

况下，印度共安德拉省委于十二月底发出在特仑甘纳地区，立游击队和收集武器的号召。这一号召获得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几个月内，武装斗争又蓬勃地开展起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二) 斗争的规模空前

起义地区遍及纳尔冈达和特朗卡卡尔全县以及附近六县的部分地区，约有三千个村庄近三百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村人民委员会，没收了地主一百多万英亩土地²¹和其他生产资料，并将它们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废除了“班吉制度”，农业工人工资增加一倍左右。农民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土地，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农民们称颂说，有生以来他们第一次能够一天饱餐两顿饭。在军事上，脱产的游击队发展到二千多人，民兵（人民志愿队）扩展到万余人，此外有少数民族上百支游击队和数千人的民兵。在高涨时期共击毙尼扎姆和拉扎卡匪军（地主武装）二千余人。敌人“被迫龟缩在大本营，只能在白天的一定时候出来抢粮食”，恶霸地主纷纷外逃，剩下的也“乞求怜悯和宽恕，表示愿意服从管制”²²。在组织上，特仑甘纳地区党员在四八年三月就从二百人发展到近万人，安得拉大会从四六年的十万人增加到二十万人。²³

(三) 斗争的矛头由主要反尼扎姆封建王朝转而主要反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联邦国大党政府。

声势浩大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不仅使尼扎姆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而且也威胁刚刚窃取政权的国大党政府的存在。因此它不能不十分惶恐。当时的副总理巴特尔叫嚷：“已经有两个县被共产党占领了，如果我们不进入海德拉巴，整个邦都要给他们占领了。”²⁴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尼赫鲁政

府以“解救人民的苦难”为名，从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开始，先后调遣五万名武装部队开进海德拉巴，与尼扎姆王朝公开结成反革命联盟，一起向武装农民开刀。印联邦军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灭绝人寰，比尼扎姆王朝之残忍有过之而无不及。仅纳尔冈达五百个村庄中遭严刑拷打的农民就有七十至八十万人。可见国大党政府刚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暴露出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完全变成了印度人民的凶恶敌人。因此，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主要锋芒“不仅指向尼扎姆，而且也指向‘移交政策’的英帝国主义和‘移交政权’后被扶植上台的新统治阶级”²⁵。

在国大党军队的血腥镇压下，数以千计的干部和党员被捕，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反攻倒算，不坚定的分子叛变反水，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特仑甘纳。仅有一小部分地区如纳尔冈达的游击队撤退到附近森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但斗争的规模 and 水平不能与高潮时期相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四九年底。

导致武装斗争第二次挫折的根本原因，同样应该从印度共中央和安得拉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兰纳地夫和拉奥、孙达拉雅等人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去寻找。

从一九四八年初至一九五〇年初二年多的时间，正是兰那地夫取代约希出任总书记的时期。兰纳地夫在约希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曾任政治局委员，是约希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当约希路线在党内引起普遍不满和反对时，他则摇身一变，成为反约希的英雄，在党内推行“左”倾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从政治上说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一次革命论”。兰纳地夫根本不结合印度的具体情况，提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所谓“交织论”。兰

兰纳地夫认为印度社会是带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印度革命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把斗争矛头指向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把整个资产阶级都看作是革命对象，把国大党政府看作是“获得了国家政权”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表面上反对这个政府，实际上给它脸上贴金，帮助它对人民进行欺骗，这种理论是印度共老机会主义者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的翻板²⁶。兰纳地夫自己承认：“我们以攻击资产阶级为借口，忘记了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²⁷；二是“城市中心”论。兰纳地夫主张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工人罢工、游行集会、起义，走所谓“俄国道路”，但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取消主义，他们连一次大罢工都没有组织起来就被国大党政府所破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根本不重视农村工作，偶然喊一下要搞农村斗争，也是为他的“城市中心论”服务的。他和约希一样有意贬低、歪曲以至反对特伦甘纳武装斗争。他自己对此供认道：“对特伦甘纳重要意义的忽视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忽视”。“关于农村地区斗争的革命形式方面，我采取了右倾改良主义态度”。²⁸兰纳地夫为了反对特伦甘纳走武装斗争道路甚至狂妄攻击诬蔑毛泽东同志。

在兰纳地夫这种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安得拉省委拉奥、孙达拉雅等人也是受其影响和支配的。省委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推动，由于中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形势的影响等因素，在特伦甘纳武装斗争高涨时期是起过一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四七年底号召成立游击队，四八年七月发表《安德拉省委决议案》强调要走中国革命道路。但是，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拉奥、孙达拉雅等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暴露出了他们反对

特仑甘纳斗争的真正面目。尽管他们与兰纳地夫矛盾重重，但在对待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这一根本问题上却不谋而合。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忽右忽左、左右交替、言左而行右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路线。请看他们的表现：

或主张停止斗争或放弃领导责任。早在四七年三一四月间，孙达拉雅在省委内就是“主停派”的头子，他曾多次向省委提出一旦印军进兵海德拉巴邦，特仑甘纳斗争就应立即停止；拉奥虽然表面上指责过孙派观点，但实际上他却认为“经济危机还未激化，人民高涨的情绪还未迸发”，²⁹他对武装斗争一直采取冷淡消极态度，他所领导的省委书记处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还没有开过会，也“没有具体的建议”，³⁰谈不上具体指导。拉奥就在印联邦军进兵土邦的前夕，竟然一走了事，甩手不管；而省委的另一重要负责人巴萨瓦潘奈亚则散布“游击战应暂时抑止”的论调，他和孙达拉雅都受到了省委其他委员的批评。³¹

继续对国大党政府抱幻想、搞投降。孙达拉雅承认，他们认为印军入海邦后“会解除尼扎姆和地主的压迫，并导致建立一个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政府。”拉奥·孙达拉雅等人对国大党政府继续散布幻想。在他们这种思想指导下，部分游击队收起武器、返回本村过太平日子去了，而他们对国大党要进兵土邦则毫无准备，麻木不仁。因而当印兵进土邦向游击队猛扑时，则完全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对兰纳地夫路线由反对到投降。国大党进兵土邦前拉奥离开安得拉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了印共政治局会议，并接受了兰纳地夫集团的“左”倾冒险主义文件（《论人民民主》、《论印度土地问题》、《策略路线》），文件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肆意歪曲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经

验，把“中国道路”称之为“反党的”“反马列主义”的。拉奥支持这些文件就背叛了几个月前他自己签署的安得拉文文件中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丢弃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在此后，四九年二月和九月在给特仑甘纳党组织的两封信中，一方面鼓吹“速胜论”，说什么如果中国革命二十二年取胜，印度则只需两年；另一方面又继续大谈农民武装斗争为全国总罢工、武装起义作准备，而且还侈谈起议会选举，宣扬武装斗争与议会选举“同时并举”的谬论。

军事上由军事冒险主义变为军事保守主义。孙达拉雅是负责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指挥官，但他是照搬英国军官传授的陆战技巧。编制上百人的所谓正规军队，穿着军服，大白天在街上大摇大摆，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作战时是与现代武器装备的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致使游击队多次被围，遭到重大伤亡。当这种战术受到批评后，又转而缩小编组，实行分兵作战，但仍打阵地战，而且打仗时不依靠群众，只凭少数分散的游击队硬拚，结果只能东奔西跑，左躲右藏，处处挨打，最后不得不采取逃跑主义。

武装斗争从恢复到最后失败与拉奥路线、 高士路线的叛卖

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虽然由于兰纳地夫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而二次受挫，但武装斗争的大旗并没有倒下，游击队退到森林后，他们在环境恶劣的困难条件下，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底到五一年十月将近两年时间里，武装斗争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又逐渐恢复而且有了新的起色和新的特点。

(一) 武装斗争仍具有一定规模。据统计，仅在一九五

○从十月至十二月间，游击队就进行了三百四十四次战斗，其中二百三十三起是袭击警察和军队，只有九一起是“谋杀”活动。³²这个时期武装力量虽然没有高涨时期强大，但仍有一定力量。据说游击队在五一年十月一个地方就有七百五十名游击战士。³³另有材料说仅在戈达瓦里森林地区的一个地段就有五百名以上的科亚族游击战士。³⁴此时游击区甚至比高涨时期还有所扩大，在四九年底安得拉省委决定在安得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游击队活动范围将近十个县。

(二) 游击队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游击队进入森林少数民族地区后，比较注意民族政策，并与群众同甘共苦，深得部落民族的支持，许多部落青年自动参加游击队。国大党曾企图用所谓“布里格斯计划”将部落与游击队割断联系，但并未得逞。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千方百计地将粮食送给游击队。据一个报告透露，在纳尔冈达和华朗卡尔两县，“乡村委员会依然存在”，“政府完全孤立，只是依靠军队和警察来进行统治”，在卡林那加和其他各县，武装斗争“正在人民中生根”³⁵。在平原地区的农民一直在进行保卫已分配土地的斗争，致使部分地区一直将这些土地守卫在农民手中。

(三) 印度国内仍具备革命形势。印度独立后，由于国内基本矛盾并未解决，而且由于国大党政府血腥镇压政策，使工农运动继续发展。在印度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仍有新的发展。一九四八年全年有二千五百次农民的斗争行动，仅联合省（现在的北方邦）就有二千零五十次地方性斗争。在四八年至五一年间，在西孟加拉、联合省、特里普拉、曼尼普尔以及阿萨姆部分地区都爆发了武装斗争。

两落三起后武装斗争的新的发展形势充分表明，特仑甘纳人民不仅有着坚持武装斗争的强烈愿望，而且也有着能够

长期坚持下去的可能。从国际条件看，则更为有利。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同年十一月毛主席给印共总书记的复电，五〇年北京亚澳工会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社论的发表，对印度的革命人民革命斗争以巨鼓午。当时，如果印度共领导能认真总结武装斗争两起两落的经验与教训，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扛到底，那么特仑甘纳的星星之火是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燎原之势的。

然而，并未出现这种局面。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机会主义路线始终占上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象走马灯式的互相取代，非“左”即右。继兰纳地夫取代约希后，拉奥又取代了兰纳地夫，而过了不到一年，高士·丹吉等人又取代了拉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又第三次再起，却最后被拉奥、高士、丹吉等人所葬送。

一九五〇年五月，由于兰纳地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印度共造成的严重损失，由于印度共广大党员对兰纳地夫路线的强烈不满，不仅迫使兰纳地夫路线走向垮台，也迫使拉奥集团为了保持自身的地位和宗派利益不得不在言论上迎合一下党员和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愿望和情绪，并参加反兰纳地夫的斗争。但拉奥上台后所推行的路线却仍然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即在言论上继承了兰纳地夫的“左”倾，行动上则继承了约希的右倾；口头上大谈“中国道路”，实际上走的既不是什么“俄国道路”，也不是什么“中国道路”，而实际则是无所作为的取消主义、议会主义道路。既使在他上台头半年狂热地大谈“中国道路”的时候，却仍然念念不忘强调兰纳地夫的“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的所谓“非法斗争”，而农村的斗争则起配合作用。

在实际上是一如既往，根本不接触特仑甘纳实际问题，根本没有用武器、物质以及一切方法来支援特仑甘纳，他至多是蹲在大城市的洋楼里发声明、写通报、脱离武装斗争实际、脱离农村广大农民。而在他上台后半年便向右派高士、丹吉投降，最后同谋合伙策划结束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极力主张参加即将到来的大选。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印共中央改组后，基本上已从拉奥路线时期转入到高士路线时期。五一年五月，拉奥辞去总书记职位，高士正式取代拉奥。高士在四七年以前是约希路线的支持者，后又成为兰纳地夫的支持者，拉奥上台后不久，他在英共修正主义的支持下，极力主张参加选举，主张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而且以英共作国际靠山，在党内拉山头、搞宗派，于五〇年底便控制了印度共领导大权。

高士取代拉奥后就采取加紧出卖特仑甘纳斗争的步伐，由有条件投降最后到无条件投降。五〇年十二月，与拉奥一起通过《关于大选的决议》等文件，正式提出立即参加大选。从五〇年底到五一年初，他们草拟了三个重要文件：《策略路线》、《印度共纲领草案》、《政策声明》，文件借口印度条件特殊，拒绝走“俄国道路”和“中国道路”。五一年五月，又伙同拉奥一起通过关于以谈判解决特仑甘纳斗争的决议》，声称，印共中央准备用谈判协议来“恢复特仑甘纳地区的和平状态”，极力表明特仑甘纳斗争不是为了推翻尼赫鲁政府，而仅仅是要废除封建压迫。但此时，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停止武装斗争，企图暂时保留一个不死不活的局面，以便同国大党政府讨价还价。同年七月，派出三人谈判代表团抵海德拉巴，将谈判条件由七条降低为三条：（1）到大选为止停止夺佃行为，将土地问题交邦议会解决；（2）撤退

特仑甘纳地区的军队，（3）释放狱中共产党员。海德拉巴邦首席部长坚持“要放弃暴力，然后才能谈判”，拒绝释放狱中党员，结果代表团于八月灰溜溜地离开海德拉巴。八月，印度共发表《竞选宣言》，号召“大家都去投票，以击败国大党”。十月印度共正式发表《关于停止特仑甘纳地区游击队活动的声明》，声称“共产党和特仑甘纳人民决心不让国大党散布‘共产党暴力行动’的虚伪宣传”，并“决定劝告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和战斗的游击队停止一切游击活动，并动员全体人民实际参加即将到来的大选，在选举中击败国大党”³⁶至此，高士、丹吉、拉奥等人彻底背弃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公开叛卖了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

正在与敌人浴血奋战坚持武装斗争的特仑甘纳干部和游击战士对高士、丹吉、拉奥一伙的叛卖行径极为气忿，并进行了抵制。阿马拉巴德地区的党组织，早在同年八月份就正式发表文件，谴责他们的投降主义行径，说他们是“一批蠢人”，痛斥他们“从背后捅上一刀”，并决定“抵制形形色色选举丑剧”，继续坚持武装斗争。³⁷巴萨瓦潘奈亚不得不承认，七百五十多名游击战士反对停止无条件投降³⁸。但是“高士及其共同党坚持结束武装斗争的路线，安德拉四个领导人后来参加他们一伙，决定这样做”。拉奥等人，过去从来不曾亲临农村前线，可在劝说特仑甘纳战士们放下武器、接受招安的时候，却格外卖劲，深入山林地区游说劝降。“由于他用尽一切办法，包括他对这些领导人（指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干部——编者）的个人影响，他的企图还是获得实现。于是武装斗争就这样完结了”。³⁹

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被出卖的结果令人悲忿。“游击队被解散了，武装被丢弃了，许多游击队员由于赤手空拳而

无法自卫，他们被军队追捕，并大批地被杀了”。⁴⁰后来政府虽然宣布取消逮捕农民领袖的通缉令，但却逮捕了所有从地下生活走出来的人，以谋杀罪及其它严重罪名来控告他们。直到武装斗争停止一年多以后，还有几百名被判刑，其中一百多人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据五二年三月统计，海德拉巴邦发出一千多张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逮捕证。⁴¹特仑甘纳的人民被投入了血泊之中。

可是就在同时，贩卖特仑甘纳斗争的英雄好汉们却与国大党首脑人物杯酒言欢，庆祝他们在特仑甘纳选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拉奥集团的一个骨干拉维·纳拉扬·雷迪在那尔冈达选区获得三十万以上选票，超过尼赫鲁在他的选区获得的选票，成为特仑甘纳的“英雄”。可是这位“英雄”的欢乐恰恰是建筑在特仑甘纳人民的鲜血和痛苦上面的。

三、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的曲折历程与印度革命派

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是印度民族民主革命历史上第二次由印度革命派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是继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十六年后，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武装斗争同议会主义道路、革命派共产党员同修正主义领导在印度的又一次新的严肃较量。但这次较量与第一次不同的是，武装斗争虽然在军事上暂时受挫，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却打了胜仗。

这次斗争从一九六七年初开始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大约六年左右时间，这次斗争同样经历了艰苦曲折、百折不挠的战斗历程。大体上可分四个阶段：（一）一九六七年三月至同年十一月，是武装斗争的创始阶段，其主要内容是西孟加

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农民起义；（二）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初，是武装斗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等地区的武装斗争；（三）一九七〇年初至年底，是武装斗争的低落时期；（四）一九七〇年底至七二年七月是武装斗争延续时期。

武装斗争前两个阶段的概况与印度革命派的贡献

纳萨尔巴里是印度西孟加拉北部大吉岭县西里古里大区的一个警察区，距尼泊尔只有四英里，距锡金三十英里，距我国西藏六十英里。统治阶级认为“纳萨尔巴里具有战略重要性”，“在同中国毗邻的地区发生叛乱，将会变成全国性的灾难”。⁴²西里古里大区（又称特莱地区）面积八百二十七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二万，二百五十多个村庄。居民主要是山居部族（少数民族）。居民中百分之七十是贫雇农，百分之二十是中农，百分之十是地主富农。⁴³

武装起义从六七年三月西里古里农民大会号召武装夺地开始。三一四月间，群众斗争迅速展开，农民协会会员从五千增至四万人。“革命农民以暴风骤雨之势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内通过数百次小组会议，组成了农民委员会，并把委员会变成村武装自卫组织”。⁴⁴他们宣布不属农民自己所有土地全部由农民委员会重新分配，并在夺取的土地上插上红旗。五月至七月，农民在当地革命派领导下，干了十件大事：重新分配土地，焚烧土地证书，废债废息，取缔囤积居奇，公审焦特达、恶霸狗腿，建立农民政权即斗争委员会，武装农民，惩办偷盗分子，宣布资产阶级法律和法庭无效等。在此期间，用弓箭、长矛、大刀武装起来的成百上千的农民队伍，曾多次向地主阶级发动进攻，并与地主武装进行

战斗。革命声势浩大，地主丢魂落魄，有的逃之夭夭，有的请求警察保护。七月七日，由印度共（马）孙达拉雅集团执政的西孟加非国大党政府开始出兵大肆镇压，实行白色恐怖，逮捕起义农民和革命派。纳萨尔巴里斗争暂时失败。

纳萨尔巴里斗争虽然受挫，但它却如一声春雷震撼了印度沉睡的大地，武装斗争由创始阶段进入高涨时期。一九六八年，在北方邦的拉金普尔县、比哈尔邦的穆沙哈里地区、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县山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即通常说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拉金普尔武装夺地的斗争始于六八年一一二月，五一六月达到高潮，但在六八年遭到警察镇压。穆沙哈里的武装夺取收成的斗争发生于六八年四月，八月间发展为武装农民同警察的冲突，六八年底遭警察镇压。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则是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影响较深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

斯里卡库兰位于安德拉邦东北部，武装斗争主要发生在同奥里萨邦接境的几个特区。这里山深林密，地广人稀，被资产阶级报纸称为是“进行纳萨尔巴里式叛乱的理想之地”⁴⁵，整个斗争地区包括山区和平原有七一八百平方英里，人口十几万。主要居住的是山居部落吉里江人。这里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六八年十一月，在斯里卡库兰县革命派领导下正式举行起义。没收了地主的全部财产，并抵抗警察的进攻。武装起义后，在斯里卡库兰建立了一一二百个游击小组二千余人，在三百多个村庄中建立了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庭，成立民兵组织和乡村自卫队，此外还建立了一支中心游击队。起义后大体分三个小的回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六九年初，是粉碎警察“围剿”的阶段；从六九年初至六月是发动群众镇压地主恶霸、巩固

游击区的阶段；从六九年六月至七〇年一月是军警进行大镇压和山区保卫战的阶段。由于山区保卫战的失败，七〇年一月中心游击队突围，分散隐蔽，斯里卡库兰的斗争接近尾声”。⁴⁶

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两地的武装斗争，虽然时隔一年，地处一南一北，但其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武装斗争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有利的客观条件。

武装斗争之所以能够爆发，决非如印度的修正主义分子所诬蔑的不具备客观基础和条件，它是印度国内阶级矛盾特别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大党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

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到一九六七年纳萨尔巴里斗争爆发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印度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它仍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国大党的土地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印度封建制度的基础，过去的王公贵族和地主老财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土地，他们照旧以分成制和雇工等形式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则照旧没有土地或仅有一块难以糊口的土地。“土改”的结果是地主大批夺佃，土地更加集中，贫雇农队伍日渐扩大。加上国大党政府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地镇压和剥削印度人民，使得印度连年饥荒，饿殍遍野。广大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两个地区农民生活状况则是全国农民的两个缩影。在纳萨尔巴里，绝大部分土地为茶园主、焦特达地主和政府所占有，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或仅有少量土地。国大党西孟加拉政府在这里实行土改的结果是更加有利于地主的掠夺。大规模的夺佃使贫苦农无地可耕，流离失所。因此这

里的农民迫切要求土地。正如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所描写的，参加纳萨尔巴里斗争的桑塔尔族人“都是无地劳动者”“他们对土地的渴望象史诗一样久远”⁴⁷，这种渴望土地的要求乃是印度五亿农民共同的要求。

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所以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发生，是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分不开的。在国内，国大党政府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政权日益不稳。在第四次大选中，国大党执政的十六个邦中有八个邦丧失统治地位，中央权力日衰。经济上工业生产停滞，物价飞涨，农业危机加深，粮食严重不足。“饥饿正在阴森森地威胁着从南方的喀拉拉邦到北方的比哈尔邦的整个国家”，⁴⁸整个印度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国际，六十年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大论战中获得巨大胜利，都极大地促进推动了印度共产党内的反修斗争和革命人民的武装斗争。

(二) 是长期以来农民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兰两地区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起义，仅纳萨尔巴里地区的桑塔尔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就曾进行过起义和游击战争。马克思在《印度编年稿》中均有记载。斯里卡库兰地区的吉里江人早在一九〇〇年也曾发生过反帝运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大党统治时期则接连不断进行斗争。纳萨尔巴里地区农民参加了五四至五五年开始的全国性争取土地的斗争，五九年参加要求“三一分成”、反对夺佃的斗争，六六年初参加全国性争取粮食的斗争，年底又进行抗租斗争。斯里卡库兰地区农民五九至六四年在吉里江人协会领导下多次进行开垦荒地等斗争，六

七一六八年起义前，吉里江农协已有五百个村子五万农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夺地等斗争，有的村子曾自发地拿起武器去反对警察部队，曾遭到军警的多次进攻和屠杀。两地武装斗争正是在这些斗争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是有着广泛群众和社会基础的，决非象修正主义所诽谤的是什么“脱离群众”的。

（三）是群众性的武装起义。

从两地斗争的全过程看，自始至终都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纳萨尔巴里地区从六七年三月至五月，有几万农协会员参加以土地斗争为中心的起义。五月至七月，农民干了“好得很”的十件大事，每次向地主阶级进攻均有几百名武装群众参加，如七月二日就有五百名部族农民同武装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因此，纳萨尔巴里地区起义的短短几个月中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个人恐怖”。在斯里卡库兰地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开始时，几十个村子数以百计的农民，拿起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夺取地主的一切财产，这场斗争不是“游击小组活动为中心的小规模的斗争，而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参加的土地斗争。六八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农民多次同警察发生激战，粉碎了他们的镇压。到六九年一月底为止，起义农民打死了数十名武装警察，在起义地区建立了政权组织，并开始分配土地。因此这时无“个人恐怖”可言。第二个回合（从六九年二月至六月）以及第三个回合（六月至七〇年一月）均有数百名甚至上千名群众多次进行所谓“歼灭阶级敌人”的行动，这些活动不只出现有进攻地主的行动，而且出现游击队、民兵（乡村自卫队）袭击警察队伍的行动；在镇压地主恶霸时，是执行区别劣迹显著的地主和劣迹较少的一般地主的政策。当然，在这个时期也有少数人组成的游击小组，

采取沒有广大群众参加的镇压恶霸地主的行动，但这不是当时的主流，应具体分析。不能如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那样一概称之为“个人恐怖”、“左倾冒险”。

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兰两地武装斗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是在以查鲁·马宗达为首的印度革命派领导下自觉进行的，其方向、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以马宗达为首的革命派共产党自一九六四年在印度共（马）同丹吉集团分裂以后，就在党内同修正主义领导进行了斗争，并以实际行动唾弃了议会主义道路。马宗达等同志于六五年就在大吉岭县深入农村部族，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号召农民“准备武装斗争”、“反对现政府”、“建立解放区”。⁴⁹六五年底又提出“建立武装小组”“收集武器”等号召。⁵⁰六六年八月革命派在印度共（马）党内秘密成立一个名为“印度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中心”的组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在革命派领导下，西里古里农会提出建立农会、武装农民、分配土地三项号召，于是爆发了纳萨尔巴里武装起义。起义受挫后，以马宗达为首的革命派于六七年十一月成立了印度共（马）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同时出版《解放》月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揭露印度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印协调委员会的推动下，全国许多省邦均爆发了纳萨尔巴里式的武装起义。斯里卡库兰地区革命派于一九六八年四月脱离了修正主义领导，正式加入了全印协调委员会，并接受了马宗达的领导，于六八年十一月正式举行武装起义。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全印协调委员会在加尔各答开会庄严宣布印度共（马列）正式诞生，通过了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政治决议分析了印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

印度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任务是推翻四大敌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决议提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建立工农联盟和革命统一战线，并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等等。

这些情况表明，武装斗争从始至终是有领导的，是在以马宗达为首的印度共（马列）革命派领导下发动的；在领导武装斗争过程中，印度共（马列）革命派深入农村广泛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重新分配土地，为创造农民根据地而努力，这种走农村暴力革命道路，搞群众路线的武装斗争道路是正确的；印度革命派在对印度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任务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国际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看法上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六九年建立了印度共（马列），从修正主义的重重锁链中冲杀出来，从组织上与之彻底决裂，分道扬镳，这是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民族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武装斗争前两个阶段受挫的原因

尽管印度革命派在领导武装斗争过程中方向、路线、道路基本正确，但武装斗争毕竟还是受到重大挫折。然而，运动的失败决不是如苏修、印修所叫嚷的是什么“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致，“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⁵¹，方向、路线对头，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或主观上经验不足，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使革命受挫，出现反复曲折，这乃

革命之常事，是不足为怪的。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兰武装斗争的受挫，除了客观上国大党政府武装镇压以及印度共（马）修正主义集团的出卖、破坏甚至亲自出兵围剿外，在主观上有如下的几点原因：

（一）印度共（马列）诞生之前，思想上、组织上没有与修正主义彻底决裂，党的领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这首先表现在，在领导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时，只看到当时对革命的有利形势，而对它所面临的新上台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过份轻视，而且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在台上的是以印度共（马）为骨干的西孟加拉联合阵线政府，它在纳萨尔巴里地区起义初期采取所谓派人“调查”，进行“政治解决”，有意麻痹革命派，并作好用武力扑灭革命火焰的准备。而革命派对此则信以为真，认为西孟政府不会搞得“过火”。事实上，5月底至7月，西孟政府已多次增兵到地义地区实行封锁、包围。对此革命派却好象没有此事，不去组织一支稍具规模的农民队伍并实行军事上的准备，等于是消极等待敌人进攻。结果当敌人军警大肆进攻时，“纳萨尔巴里起义者没有实行抵抗，连一枪也没有打响”⁵²，从而使西孟联合阵线政府不费很大气力就将刚燃起的星星之火扑灭了。这种右倾轻敌、麻痹，正反映革命派在思想上当时还没有能与之彻底决裂。

其次表现在，组织上与修正主义集团藕断丝连。纳萨尔巴里起义时仍然打着印度共（马）的旗号，农民在夺得的土地上也是插的这一旗帜。六六年名为“印度共毛泽东思想中心”只是作为印度共（马）的一派。六七年十一月成立的印度共（马）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仍未放弃印度共（马）的旗号，它的成员有许多留在印度共（马）党内。斯里卡库兰地区的革命派党员直到六八年三月还在受修正主义集团控

制。由于缺乏旗帜鲜明，与修正主义分子彻底决裂的党组织，对于号召、团结广大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

再次表现在，斯里卡库兰地区的武装斗争自始至终均没有得到党的坚强领导。该地区早在六七年十月前，形势就对革命派非常有利，吉里江人已有一千多枝前膛枪，群众对两名吉里江人干部被屠杀极大愤慨，纷纷要求用武力对抗。但由于当时的印度共(马)邦委借口起义不成熟和需准备训练，而坐失起义良机，以致使敌人在六八年初逮捕了五百多吉里江干部和党员，缴获了大量斯里卡库兰地区的武器。六八年十一月在斯里卡库兰县委领导下举行了起义，邦委也未给予支持。而当时的全印协调委员会尚不是正式党中央机构，而且总部设在西孟加拉，对指导斯里卡库兰地区的武装斗争显得“鞭长莫及”。马宗达在六九年三月访问这一地区，但也缺乏具体措施和具体指导。印度共(马列)成立后，也未能给予坚强的领导，而且当时反动军队已开始向山区包围，局势已难扭转。

(二) 军事上右倾保守、消极被动，没有明确的建军思想和正确的建军路线。

根据桑亚尔的《特莱报告》，在纳萨尔巴里地区，军事问题被“忽视了”，党和人民“既没有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军事上作好最充分的准备”以抵抗敌人的进攻，而“当人民准备对敌人发动袭击的时候”“又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害怕这种袭击可能带来的影响”，因而不敢找有利的时机向敌人进攻，结果把“战略防御变成了消极防御”⁵³，在斯里卡库兰地区也是采取这种消极被动的作战方针。六九年下半年反动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时，虽然兵多势众，但敌人却十分害怕山上的游击队。有一次山上无意爆发了一颗手榴弹就把前来袭击的警察吓得不敢进村。在这种形势下，如果采

取正确的作战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是可以击败来犯之敌保卫山区的。但当时的中心游击队和指挥部却只是固守山顶，游击队成员则分散隐蔽于群众之中，既不分兵发动群众保卫山区根据地，也未集中兵力采取积极果断措施。因而形成了一个消极挨打的局面。六九年十一月，反动派进山实行三光（烧、抢、抓）政策，结果七百多人被捕，夹在里面的二十个中央和地区领导人被害，县一级的领导几乎全部被捕。许多游击队战士和干部都是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杀害的⁵⁴。七〇年一月一支小的中心游击队突围成功，但是突围后，仍然进行分散活动，以潜伏为主。

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兰武装斗争在军事上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建立正式的人民军队。在纳萨尔巴里起义时，“错误地以为武装的人民就是武装力量”⁵⁵。实际上，这时建立的“武装小组”，至多是赤卫队性质的组织。而这种组织也未受重视，认为它们可以靠“自发产生”。这种武装小组主要使用的是传统武器，他们缴获的枪枝不到十条，这当然不可能与前来围剿的正规军警作战。在斯里卡库兰地区，马宗达曾建议斯里卡库兰县委建立解放军，但并未在实践上实行。二千多游击队员大多分散在各游击小组中，仅有少数的中心游击队集中在山顶。如果将这些分散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稍具规模的人民军队，来与敌人周旋，是不致于为敌人各个击破的。据官方报导，斯里卡库兰的六十多股游击队，到后来只剩下两股。⁵⁶

这种军事上的缺陷乃是武装斗争受挫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

（三）没有鲜明的土地纲领基础上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没有把武装斗争和土地斗争结合起来。

革命派领导人和他们的文件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但却缺乏一个明确的具体的土地纲领，而且在实践上也沒有做好。他们的指导思想似乎是先搞武装夺取政权，然后再进行土地改革，而较少考虑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用农民的土地斗争来推动武装斗争。根据《特莱报告》，六七年三月，西里古里农民大会号召“通过农民委员会重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行动了起来，并宣布“凡过去不属于农民所有，不为农民自己耕种的土地都要由农民委员会重新分配”，但实际上“沒有重视这项工作”，“搞成非常形式的事情”，“结果产生了一些严重问题”，如富农阻挠，上中农掌握领导权，没收土地转变为搜查焦特达的住所，贫农与中农发生尖锐矛盾等等。因此，土地革命“遭到的失败挫伤了这场斗争期间和这场斗争以后的阶级斗争的锐气”⁵⁷。斯里卡库兰地区同样也沒有在实践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武装斗争的低落与印度 革命派政策路线上的问题

七〇年一月斯里卡库兰地区武装斗争受挫后至这年年底，将近一年时间，这是武装斗争的第三个时期，即低落时期。其基本特点是：（1）斯里卡库兰山区保卫战失败后，游击队丧失了向警察部队袭击的能力，结果只保留着各个孤立分散的游击小组，采取秘密暗杀地主的行动方式，脱离了群众，背离了大方向。（2）在西孟加拉、安得拉、比哈尔、旁遮普、奥里萨等邦虽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武装游击活动，时起时伏，断断续续，但是象前两个时期那种较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起义和行动却沒有再发生，比较著名的西孟加拉

的德布拉——戈皮巴拉瓦普尔和比尔布姆的武装斗争，在七〇年也是以“歼灭”地主为主，与前一时期作法大不一样。

(3) 七〇年四月前后，在加尔各答掀起了一场被称“文化革命”的运动(袭击学校、图书馆、砸烂甘地象，烧毁他的著作)延续将近一年。在本年八月间，运动又演变为所谓“城市游击战”(暗杀警察活动)，这也反映了农村武装斗争的低潮形势。

武装斗争出现这种低落形势是与下面两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

(一) 对形势的估计：“速胜论”和“自发论”。

七〇年初，斯里卡库兰武装斗争遭挫后，如果能够客观地分析形势，采取有效措施，则颓势还是可以挽救的，但印度革命派却相反大谈印度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对形势估计盲目乐观。认为“在一九七五年结束时，五亿印度人民将能写完他们伟大的解放史诗”“一九七〇年有希望出现一支有纪律的解放军和一片广阔的解放区”⁵⁹。在马宗达看来，“随着武装游击斗争自发产生的群众高潮就和雪崩、雷鸣般地到来”⁵⁹，“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落都象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这种“速胜论”“自发论”，一方面反映了武装斗争受挫后的急躁情绪，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崇拜自发性的偏向，不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艰苦奋斗，创造有利条件，逐步打开局面，争取最后胜利。因此它不能不极大地妨碍人民战争的布署和安排。

(二) 关于“歼灭阶级敌人”的方针。

马宗达关于“歼灭阶级敌人”的提法在不同时期，其内容不大一致，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挫折，则越益偏离马列主义。马宗达在六六年八月提出打击对象有三：警察警官、官仔和阶级敌人；在六八年十月，马宗达向斯里卡库兰县委建

议“把行动集中在歼灭阶级敌人方面，并从这个角度去消灭警察部队”⁶⁰；在那些时候所提的“歼灭阶级敌人”并不单纯意味着消灭个别地主，在实际行动上，进攻阶级敌人的时候有大量群众参加，并不是什么“个人暗杀”的做法。但在斯里卡库兰斗争受挫以后，性质就开始变化了。七〇年五月马宗达在印度共（马列）“一大”上说“必须懂得歼灭阶级敌人的战斗既是阶级斗争的较高形式，又是游击战争的起点”，它“能解决摆我们面前的一切问题”⁶¹。七〇年以后“歼灭”的作法是由三至五人组成的游击小组，用传统武器弓箭、大刀、长矛，秘密地突然出现，将地主坏具杀掉就跑，事先既不让群众知道，事后又不向群众作宣传讲明。因此这种“歼灭”活动严重脱离群众。游击小组七〇年在孟加拉邦德戈地区曾进行了一百多次这种暗杀地主的活动，但群众却没有被发动起来，就是明证。

这时期在加尔各答地区的“文化革命”和“城市游击战”，据一些材料分析主要是自发性的，并非是印度共（马列）领导组织发动的。从马宗达当时的指导思想来看，他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且号召城市青年大批到农村去。但是，马宗达对城市工作却没有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对于城市青年的偏激行动，只称赞他们勇敢热情的一面，而忽视其造成不好影响的另一面，因此后来给以鼓励支持，结果给敌探、流氓等坏分子以乘机破坏的机会，使阶级敌人有了攻击印度革命派的种种借口，是非常失策的。

虽然印度共（马列）这个时期有了这一些问题，但是恰在这个时期，即七〇年五月召开了“一大”（后又改称“八大”）通过了党的纲领。印度共（马列）在印度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及革命总的方针路线，在国际国内

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看法。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坚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进行持久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与六九年建党时的观点是一致的。

武装斗争的延续与印度革命派的分裂

一九七〇年年底之后至七二年七月，近二年时期，武装斗争有了新的转机，马宗达自七〇年年底以后，已放弃了“歼灭阶级敌人”这一错误方针。他这个时期强调的是：

（1）要发动对武装部队的袭击。他强调说，如果不“对敌人的武装部队发动袭击，那么我们会使自己陷入某种经济主义的泥潭”²⁶因此，这个时期袭击武装警察的数目比过去一年大为增加。据报道，仅在七一年七——八月有八十九名被游击队消灭，七百六十一名被打伤⁶³。（2）强调要建立“一支人民军队”，而且在七一年初就宣布孟加拉的游击小组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小分队。而这支部队“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建立革命政权”⁶⁴。尽管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未建立起来，但马宗达改正错误的用心是很清楚的。（3）改变了过去不准游击队使用火器的错误，反复强调要夺取敌人的枪枝，并用夺得的枪枝武装游击小组。在马宗达的指示下，在西孟加拉掀起了一个从敌人手中夺枪的运动。据报道，“比尔布姆地区已夺到二百条枪，平均每天至少有五支到十支送到党的手里”⁶⁵。（4）改变了过去不重视武装斗争以外的斗争形式的作法。马宗达在七一年七月曾号召群众开展“夺取庄稼运动”“号召无地农民保卫土地和庄稼，组织村民兵”等等。在马宗达的号召下，一些地区发动了夺取稻谷的行动，而且有上百群众参加。⁶⁶

这些情况表明，马宗达的确是在改正错误，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在迈进。但是这个时期，有几个不利因素妨碍了错误的彻底改正和武装斗争的顺利发展。其一，印度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印度共（马列）党内不安定和混乱状态，加强收买叛徒、派遣特务、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残酷镇压革命力量的阴谋，先后捕杀了印度共（马列）的重要干部，最后在鲁、马宗达于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并在狱中牺牲。这对印度革命派不能不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其二，马宗达本身虽然对错误有所认识并着手改正，但没能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其三，最为重要的是，印度共（马列）党内宗派主义思想泛滥，导致党组织的大分裂，使本已好转并有发展希望的武装斗争又重新陷入停滞局面。

四、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综观特仑甘纳和纳萨尔巴里两次武装斗争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曲折而复杂，各自的斗争历程不一，失败原因也相异，但却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可寻，即可以探寻出印度革命长期不能合乎逻辑地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以及印度革命的基本经验教训。

关键在革命党和路线

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证明，革命顺逆，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真正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一九四六年——五一年武装斗争所以三起三落而最后陷于失败，是四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的结果，特别是印度的机会主义头子们在人

民革命的紧要关头，实行投降叛卖的结果。这是印度人民惨痛的血的教训。一九六七——七二年的武装斗争几起几伏，最后受挫失败。这次武装斗争的前期和中期除了由于印度共（马）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甚至出兵镇压外，从革命方面说路线基本上正确，但由于缺乏经验，政策上有偏差，使高涨的武装斗争两次受挫。武装斗争的第三阶段（一九七〇年），革命派在政策路线上仍有错误，使武装斗争处于低潮。武装斗争的第四阶段（七一年至七二年八月）由于马宗达同志牺牲，特别由于党开始分裂，使武装斗争一蹶不振，停滞不前。但无论如何，两次武装斗争受挫、失败的关键是党和路线本身的问题。

那么，怎样估计印度革命的客观条件呢？印度的修正主义者有两个谬论：（一）印度革命“未成熟”论；（二）敌人强大论”。总之，是“客观决定论”。

关于是否具备革命形势问题，关键是看社会基本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毛主席曾指出：“要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⁶⁷又说，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条件”。⁶⁸基于这种认识，印度不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不论在两次武装斗争爆发时期，还是在武装斗争的中期和后期都存在、具备革命条件和革命形势。这里必须明确，这里所提的革命形势不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举行起义的革命形势或革命高潮，而是指象中国、印度这类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武装斗争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条件。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领导创建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恰恰是在革命最低潮时进行的，难道所说这时没有革命形势吗？

两次武装斗争所以爆发并各自延续五六年之久，乃是印度社会基本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是完全具备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的，既具备客观条件，又具备群众基础。上述大量事实已能证明这点。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⁶⁹革命起来了也不一定能成功。关键还要有个革命政党和正确路线的指引。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五个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量”⁷⁰两次武装斗争缺乏的就是“有很好的党”。其他四条可以说基本具备。印度是否具备革命客观条件的问题，连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都不否认。美国教授凯恩林说：“印度贫苦农民日益觉醒，逐渐看穿政府的土改骗局，斗争性增强。一九六七年著名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可以说，今日印度农村活象一个外绿内红的熟透了的西瓜，只等革命左派去开刀”⁷¹。这种比喻不一定很妥，但说明印度确是到处布满干柴，只要有马列主义政党去点燃，印度的星星之火，是一定能够形成燎原之势的。

关于对敌人力量的估计问题，革命导师历来主张要切当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政权在独立后不仅全盘继承英帝遗留下来的一整套完整统一的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且从英帝那里学会一整套狡猾而阴险的欺骗人民的手法，通称有六大骗术：议会民主，宗教信仰、甘地主义、“社会主义”、分而治之，收买两个修党。敌人的这种特点对革命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障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延缓、推迟革命的作用。但是它不起决定性作用。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便是有力的证明。两次武装

斗争每次都面对着比自己多数十倍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军队，但两次斗争却每次都打了五、六年之久。凶残的国大党军队曾狂叫两个月之内平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但特仑甘纳人民甚至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仍能坚持斗争不断主动出击敌人。斯里卡库兰的中心游击队在最后能够一举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继续战斗。今天纳萨尔巴里式的武装斗争仍在印度一些地方不时出现并坚持斗争。如再联系到印度那加、米佐等少数民族坚持武装斗争的事实说明国大党的军队不是不可战胜的。两次武装斗争的失败固然是敌人疯狂镇压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党和路线本身的问题，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印度的议会、宗教、民族情绪、甘地主义之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和阶级矛盾，转移阶级斗争视线作用”。⁷²但这些东西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些东西在特仑甘纳、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兰地区不可谓不盛行，可以说是“六毒俱全”。但是一旦这里的人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拿起武器才能获得解放，便冲决这些长期束缚他们的罗网，向解放的路上迅跑。什么甘地主义，什么议会讲坛，什么宗教信仰，什么“社会主义”，什么修正主义，通通打翻在地，一脚踢开。革命党和人民不能离开或超越客观条件和客观基础，去同敌人乱撞乱碰，然而却可以凭借这个舞台化险为夷，化害为利，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的。

两次武装斗争证明：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一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革命不可能真正搞起来，即便搞起来了，也会起而复落，不能持久。

印度无产阶级未能粉碎帝国主义的锁链，“回答只能从总结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寻找”。⁷³

革命道路问题

印度革命应走什么道路，这是关系到印度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印度共产党内两条路线尖锐复杂的斗争正是围绕着一根本问题展开的。

印度共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两次武装斗争中表现形式各别，有的以右的面目出现，公开鼓吹合法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有的以“左”的面目出现，大肆宣传“城市中心论”；有的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竭力贩卖议会选举与武装斗争的“同时并举”的论调。但是，他们殊途同归，都是武装革命和人民战争的反对派和叛卖者，都是议会道路的狂热鼓吹手和实践家。同时他们的议会道路也都是在两次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宣告破产。他们的议会主义自战后开始直到今日，已整整走了三十年，走来走去，走出了什么呢？印度的旧秩序依然如故，统治阶级利益毫毛未动。他们通过选举苦心经营的“非国大党政府”，只不过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御用工具。对印度修正主义者的议会道路及其实质，如果在特伦甘纳时期还没有看清的话，那么经过纳萨尔巴里时期至今，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再清楚不过的了。印度修正主义议会道路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埋葬印度革命的道路，是死路一条。

印度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两次武装斗争要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印度革命之所以走这条道路，是由印度的革命特点所决定的，并非人们的主观臆造。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人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

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印度，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⁷⁴

印度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泛的同盟者。一旦几亿印度农民被发动起来，就会形成印度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印度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点是和中国相类似的。这是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不但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有社会帝国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这四大敌人的代理人不断强化国家机器残暴地镇压印度人民。他们长期地占据着印度的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加上印度幅员辽阔，广大的农村有着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天地。因此印度革命者就可以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这是二。

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印度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两次武装斗争的正反经验都证明，这是印度革命的必由之路。

高士、拉奥等人在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后期，为出卖武装斗争走议会道路，欺骗党内外群众，掩人耳目，曾提出议会选举与武装斗争“同时并举”的论调。他们借口“印度特殊”，说什么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工人数目多，交通发达等等，因此既不能走“俄国道路”，也不能走“中国道路”，而要走印度独特道路，即“城乡并举”、“议武并举”的道路。这一论调一直为印度修正主义集团所继承，同时革命派内部也有人受其影响。这种论调是纯属欺人之谈的修正主义理论，是早已破产的议会道路的同义语。但由于它以伪装面目出现，而且打着“利用议会”的旗号，颇有迷惑人的一面，值得重视。

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性质及对待它的原则，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很多论述。马列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参加议会斗争，利用其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但是有两条原则：（1）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企图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2）不是在一切条件、一切国家、一切时候、凡有议会者都要利用。在什么条件下利用，要根据具体情况。列宁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过程中，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并正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就坚决抵制杜马（俄国的议会）；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也坚决抵制了预备国会。

在印度今天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执政的国家里，怎么对待议会呢？印度修正主义者则根本背弃上述马列主义的原则。印度革命派绝大多数则认为应该采取坚决抵制的作法。这种作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印度统治阶级不允许你两手并举。两次武装斗争血的教训已是最好证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

印度共安得拉省委参加选举，下半年因为特仑甘纳搞了武装斗争，国大党政府立即在安得拉地区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印度共领导人和革命群众。一九五一年十月以前，由于没有正式放下武器，国大党根本不与印度共代表谈判。十月后，当印度共宣布接受招安，国大党才同意它参加大选。一九六七年印度修正主义集团，通过选举在西孟加拉执政后不到几个月，就出动大批军警将纳萨尔巴里地区的武装斗争镇压下去。一九七七年，革命派中有人宣布放弃暴力，接受招安，参加议会选举，德赛政府于是才放出狱中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十分清楚，统治阶级的原则是：“你放下武器，我给你投票箱；你要在我头上动土，对不起，我就给你监狱”。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第二，印度革命特点是长期的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印度革命的这一基本特点，就决定不可能在搞武装斗争的同时又去在城市搞公开的议会斗争。（当然这并非完全否认通过其他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的议员在议会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作法。）

说农村武装斗争是唯一正确道路，并不是说要损害或放弃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证明，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以武装斗争为最高形式，其他斗争为辅助形式，相互配合。既不能象约希、孙达拉雅在特仑甘纳斗争时期只主张搞群众运动、搞局部的经济斗争，否定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片面的作法，也不能象印度革命派在纳萨尔巴里时期曾一度只片面强调“游击战是唯一形式”而忽视甚至放弃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错误倾向。

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

无产阶级能否掌握革命领导权，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要取得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高举反帝运动的大旗，领导人民把斗争锋芒对准印度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必须高举反封建大旗，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正确处理好与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否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是斗争大方向的问题。抓住这个大方向乃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前提。但第一次武装斗争时期，印度共领导人则背离这个斗争大方向。他们要么如约希路线时那样，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支持蒙巴顿方案，在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地区只反尼萨姆封建王朝，只准搞所谓的“局部斗争”，实行民族投降主义；要么如兰纳地夫路线时那样，“以攻击印度资产阶级为借口，忘记了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⁷⁵，在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地区主张只应举行保卫土地的斗争，而不是推翻代表帝国主义的联邦政府；要么如拉奥、高士那样表面上反国大党政府，实际上自动放下武器接受反动派的招安，从而从根本上放弃了反帝大旗。第二次武装斗争时期，印度共（马列）把美苏两霸作为革命对象，把矛头直指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大党政府，其反帝大方向总的说是对头的。然而，印度革命派在理论上却没有把帝国主义同印度人民大众的矛盾看作是印度最主要的矛盾，却片面地把印度的主要矛盾归结为封建主义同农民的矛盾。由于这种认识，他们一方面，没有积极领导印度广大城乡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没能组成一支反帝的统一战线；另

一方面，在一个短时期内仅仅进行“歼灭”地主的活动，而放过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这样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大方向。

由于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主要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反帝与反封建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的。正如毛主席指出：

“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⁷⁶

两次武装斗争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都作了尝试，特仑甘纳和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高涨时期在革命派领导下进行了土地分配的伟大斗争，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积极性。但是，总的来，两次武装斗争都没有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把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特仑甘纳斗争初期，约希极力把农民土地要求局限在合法范围之内，将土地分配限制在五百英亩的限额，实际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武装斗争高涨时期，在革命派领导下分配了一百多万英亩土地，这是印度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但却受到兰纳地夫的“土地国有化”“分配其使用权”错误土地纲领的干扰和破坏，而当国大党军队进兵海德拉巴后，农民的土地则大部分得而复失。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创始和高涨时期，农民在革命派领导下纷纷夺地，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土地纲领，土地革命并未真正实行，在斗争的中后期，在受挫的情况下更没有将土地斗争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证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印度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它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因为封建地

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印度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印度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印度革命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也证明，土地革命必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既要反对不搞武装斗争的所谓单纯的土地斗争，即只搞局部斗争的机会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只单纯搞武装斗争而忽视农民的土地斗争的错误倾向。

两次武装斗争在对待不同的资产阶级问题上也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武装斗争时期，印度共机会主义领导或者从根本上放弃独立自主原则，不敢领导武装斗争，不敢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实行彻底决裂，反而采取“团结”“拥护”的方针，做大资产阶级的尾巴（如约希），或者表面上把国大党政府看作是大资产阶级政府，声称要在选举中击败它，而实际上却是无耻地出卖武装斗争而公开向大资产阶级交枪投降，以革命人民的鲜血换取合法地位，从根本上放弃了反大资产阶级的旗帜（如高士、拉奥）；要么把整个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对象，把斗争矛头指向印度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表面上反对国大党政府，实际上是美化国大党政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放弃反帝、反封、反买办资产阶级的大目标（如兰纳地夫）。总之，他们没有区别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应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而不去联合，应该与大资产阶级决裂、斗争的而不敢决裂、斗争，对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尼赫鲁政府从妥协、美化到投降。

第二次武装斗争时期，印度革命派唾弃了修正主义者对大资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高举了武装斗争大旗，矛头直指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国大党政府，大方向总的说是对

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没能从理论上到政策上加以明确解决，错误地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只有在建立红色政权以后才能实行；而在对待大资产阶级国大党的政权问题上，由于一度将主要精力放在“歼灭”地主分子活动上面，因而没有把斗争锋芒一直对准国大党政府。

印度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大党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物。英帝为了维持它在印度的统治，便在印度扶植了一个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作为它的社会基础和支柱。印度国大党则是“作为捍卫英国统治，对付日益增长的人民骚动和反英情绪的一种预定武器”。⁷⁷印度国大党从成立一直到印度独立，一直充当这种“预定武器”或“安全伐门”。慑于战后人民的反英高潮，英帝才“平衡和顺利”地将统治权在“基本上保留英国殖民者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把统治权转让给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⁷⁸在独立后，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就进一步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忠实代表者，越来越深地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因此，印度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但是，印度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独立前，出于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反帝运动，喊过一些激进口号；在独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有时对帝国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别性，有一定矛盾。革命党人为了打击最主要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已经不存在，已经破裂的情况下，如在战后初期，印度国大党已经正式决定把共产党驱逐出国大党，并到处指控、屠杀共产党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就该毫不妥协。

地敢于决裂，敢于对它实行坚决严肃的武装斗争。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很早就参加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由于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无能，使得大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窃夺了革命领导权，冒充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基本上处于追随者地位。独立后，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矛盾也逐渐加剧。但不论独立前还是独立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因此，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内，都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也始终应该采取这种无产阶级的政策。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时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这是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也是印度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党的建设问题

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表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第一次武装斗争时期，党内虽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搏斗，但是在党内从中央到省委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尽管以基

层党员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用实际行动几次突破修正主义框框，使受挫的武装斗争一起再起，但善于伪装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却利用党员识别能力不强、斗争不力，两面讨好，使武装斗争三起三落，最后被出卖。第二次武装斗争时期，印度共（马列）革命派高举了马列主义大旗，从政治上同印度修正主义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在思想上却没能与修正主义彻底划清界线，特别是在武装斗争的前两个阶段，往往估计不足，对武装斗争领导不够得力。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两次武装斗争的反复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武装斗争时期，四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不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二不了解印度的具体情况，三更谈不上结合。他们不是盲目崇信修正主义的“国际领导”，推行议会的和平过渡（如约希、高士）；就是不加分析地照搬“交识论”，外国的所谓“城市中心论”，（兰纳地夫）；要么就是一时标榜所谓“中国道路”，一时又肆意攻击我国革命（如拉奥）。第二次武装斗争时期，以印度革命派“在党内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原则方面，有着重大的革命贡献”。⁷⁹而且试图将这一伟大原则应用于印度革命实践。但是，他们还缺乏经验，对于印度的社会状况和革命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印度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往往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急于求成，企图走捷径。两次武装斗争的经

验告诉我们，只有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的实际相结合，印度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

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仅要有政治上思想上路线的正确，而且要有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集团和组织上的巩固。”战后初期，印共中央领导虽然三次更迭，但党的领导大权却一直落在修正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出身于高级种姓，受过英国的奴化教育，崇拜甘地主义，投机入党后，高居于党员干部之上，从不深入工农实际，养尊处优，过着豪华的贵族生活，有的早就是公认的叛徒、工贼、内奸，如丹吉；他们拿路线斗争做幌子，在国际上找靠山，在党内拉山头，侵吞反“左”右倾路线斗争的胜利果实，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大搞分裂宗派活动。印度革命正是葬送在这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的手上。不同他们作严肃的斗争，不冲决他们的罗网，革命要取得进展是万万办不到的。以马宗达为首的革命派终于在一九六九年从组织上与修正主义一刀两断、彻底分家，正式成立印度共（马列），这是印度革命的伟大成就，是革命派反修斗争的重大突破，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革命派由于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太短，尚没有能够锻炼、成长、形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集团。而在武装斗争的后期，党内存在着意见分歧和宗派观念，产生对党大大不利的不团结现象。致使正在形成中的革命领导集团陷入分裂。而马宗达同志的牺牲，就使印度共（马列）失去了一位革命的领路人，使革命不能不受巨大损失。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证明了列宁的如下教导：“培养一批有经验，有相当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⁸⁰。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

也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⁸¹。

军事路线问题

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证明，革命要取得胜利，不但需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条军事路线要求，必须建立一支从无到有，从大到小的具有相当力量的正式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支军队必须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建军方面，两次武装斗争都没有重视建军和扩军工作，也都沒有注意思想上政治上建军。第一次武装斗争时期，曾经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但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起初只照搬西方，成立所谓“正规军队”，后来又走向另一极端，全都变成分散力量的游击小组，军纪松懈，单纯打仗，不依靠群众。第二次武装斗争时期，创始阶段只有原始形式的武装小组；高涨阶段虽有一支相当力量的武装力量，也是沒有组成正式的人民军队；第三阶段又都完全变成脱离群众的游击小组；第四阶段，虽然宣布建立人民解放军，但实际上仍是各自分散，终未建成。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曾指出过的：“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沒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⁸²

在战略战术方面，两次武装斗争也沒有按照正确的原则进行。第一次武装斗争时期，开始是西方的作战方法，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后来又转为单纯分兵作战，实行既有冒险主

义又有保守主义的作战方法。第二次武装斗争时期，基本上采取分散隐蔽、消极被动的作战方法，后来又一度陷入单纯的“歼灭”地主的活动。总之两次武装斗争似乎均没有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⁸³，“诱敌深入”⁸⁴，“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⁸⁵等项战略战术原则。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二十八年民主革命的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⁸⁶。中国人民战胜三大敌人靠的就是这三种主要武器。印度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已证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也不能不是印度人民战胜四大敌人的主要武器。

五、印度革命前途展望

印度革命自印度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过了五十八个年头了，虽然经历了两次武装斗争，但革命尚未起来。印度革命前途如何？到底能不能起来呢？这是举世瞩目的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速胜论”，也要反对“悲观论”。

“速胜论”者认为，印度革命不要多久就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事实证明，这种估计是不恰当的。两次武装斗争的历史说明，印度革命能够起来不易，发展壮大，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更不易。革命党和人民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而且要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只有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实践，特别要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失败后，从革命派主观方面看，组织上仍四分五裂，目前尚缺乏众望所归的革命权威和革命组织；思想政治路线上的一些是非问题尚未完全端正，彼此分歧距离较大。总之，目前，仍在动荡、分化、改组之中，由大乱到大治，非一朝一夕所能见效，因此不容盲目乐观。

“悲观者”认为，印度革命无成功之可能，或可能也是遥遥无期，渺茫无际。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持这种论点者多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而看不到有利的一面。从客观上看，印度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英·甘地的王冠落地而有所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由于苏美争霸的加剧而日趋激化；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高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等等，都为印度革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从主观上看，与第一次武装斗争被出卖而使革命延缓停滞整整二十年的情况根本不同，第二次武装斗争虽然在军事上受挫，但革命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却打了一个胜仗，政治上进行了反修的伟大斗争，在印度人民中间广泛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上与修正主义分道扬镳，打破了修正主义一统天下的万马齐喑局面，为各革命派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第二次武装斗争在军事上也只能是暂时挫折，印度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自七二年以后，并没有彻底停息，革命的枪声一直没断。这种枪声尽管目前还很微弱，但它却象征着印度革命的希望。此外，印度各革命派虽然派别林立，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他们经过目前的大辩论，依靠基层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巨大革命潜力，对党内外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左”倾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经过对纳萨尔巴里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马列主义水平、路线觉悟必能来个大大提高，必能由大乱而走向大治，逐渐缩小分歧，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重新团结起来。

印度革命道路曲折，前途光明。“速胜论”要不得，“悲观论”更要不得。这就是当前印度革命形势所提供的客观结论。

毛主席早在四九年时就指出：“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⁸⁷。我们坚信，特仑甘纳和纳萨尔巴里的星星之火，一定会在布满干柴的印度大地上重新点燃，并终将燎原。革命导师的预言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变成现实。让我们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准备着举起双手，去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吧！

注

1. 印度人口目前无准确数字，目前印度报刊较多的是用六亿一千万的数字。
2. 《宁肯少些，但求好些》（1923年3月2日）《列

- 宁选集》四卷710页。
3.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1908年）《列宁全集》十五卷158页。
 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73页。
 5. 《斯大林全集》六卷87页。
 6. 见杜德：《今日印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53年版上册，35—46页。
 7. 凯恩林·高夫：《印度农民起义》（1974年）
 8. 马克思：《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九卷226页。
 9. 安德拉省委文件：《论特仑甘纳运动》
 10. 孙达拉雅：《大安德拉》。
 11. 德·文·拉奥：《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道路》9页。
 12. 根据协定，印度政府同意海德拉巴邦推迟一年以后解决加入印度联邦问题。
 13. 印度共中央《关于前总书记……对毛泽东同志的反党批评所通过的决议》。
 14. 印度共中央委员会决议：《为了最后的进攻——印度人民在印度革命现阶段中的任务》。
 15. 孙达拉雅：《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51页，三联书店，1976年，厦门大学译。
 16. 安德拉省委当时领导马德拉斯地区的党组织和整个海德拉巴地区的党组织。
 17. 印共文件《安德拉的情况》（1951年1月）。
 18. 印共文件《特仑甘纳运动及途径》（1949年2月）。

19. 《印度共安德拉省委书记处自我批评报告》（1950年2月24日）
20. 《安德拉省委论特仑甘纳运动》（1950年10月7日）。
21. 沒收的标准有三类：第一类是二十英亩水田和一百英亩旱地；第二类是二百英亩干地；第三类是十英亩水田和一百英亩旱地。见安德拉省委：《论特仑甘纳抵抗运动的关键问题及解决途径》
22. 孙达拉雅：《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107—119
23. 同上
24. 安德拉省委：《论特仑甘纳抵抗运动的关键问题及解决途径》
25. 德·文·拉奥：《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道路》
26. M·N 罗易是印度共早期的创始人。
27. 《“我要揭露自己”——兰纳地夫》《解放》月刊1968年2月号。
28. 同上
29. 拉奥：《警察袭击与我们的任务》引自安德拉省委《自我批评报告》。
30. 《论特仑甘纳抵抗运动的关键问题及解决途径》（1949年2月）
31. 《省委书记处对武装斗争抵抗问题上各种偏向的批评》（1949年9月）
32. 见 M·R·玛萨尼：《印度共产党简史》125页
33. 见德·文·拉奥：《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

道路》

34. 孙达拉雅：《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35. 印度共参考文件第九号：《关于特仑甘纳的情况》
36. 《十字路》周报1951年10月26日
37. 德·文·拉奥：《特仑甘纳武装革命和印度革命道路》附录一。
38. 同上。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全印农协中央理事会《关于要求撤消迫害特仑甘纳农民案件的结论》（1953年7月）
42. 《印度斯坦旗报》1967年6月9日。
43. 见卡努·桑亚尔：《特莱报告》
44. 同上
45. 《印度时报》1968年3月23日
46. 巴巴尼森·古普培：《印度政治中的共产主义》
47. 《印度斯坦族报》1967年5月29日
48. 引《人民日报》1967年8月27日
49. 马宗达：《印度自发革命高潮的源泉是什么？》
《解放》75年8月号。
50. 马宗达：《1965年提出了什么可能性》。
5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52. 桑亚尔：《纳萨尔巴里运动》12页。
53. 桑亚尔：《特莱报告》《解放》1968年11月号。
54. 《斯里卡库兰地区武装斗争的回顾》《解放》（辛格派）1973年1月—3月号。

55. 桑亚尔：《特莱报告》
56. 《印度快报》1970年7月
57. 桑亚尔：《特莱报告》
58. 马宗达：《使七十年代成为解放的年代》《解放》
1970年2月号
59. 马宗达：《政治组织报告》
60. 斯里卡库兰县委：《关于斯里卡库兰武装斗争的报告》
61. 《关于政治组织报告》《解放》1970年5—7月号
62. 马宗达：《加强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解放》
1971年1—3月号。
63. 《解放》1971年7月—72年1月
64. 《解放》1971年1—3月号
65. 《比尔布姆武装斗争的回顾》《解放》1971年7月
—72年1月号
66. 《解放》1971年7月至72年3月
67. 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
105页。
68. 毛主席：《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
选》52页。
69.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二卷620
页。列宁这里讲的革命形势主要指革命高潮，是针
对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成熟时机讲的。
70. 《毛选》59页。
71. 凯恩林·高夫《帝国主义与南亚革命的潜力》
(1973年4月)
72. 同上注

73. R. P. 萨拉夫《印度社会》
74.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506页。
75. 《“我要揭露自己”——兰那地夫》《解放》月刊1968年2月号。
76.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600页。
77. R. P. 杜德：《印度的今天和昨天》116页。
78. 《人民日报》编辑部：《从中印边境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1962年10月27日。
79. 印度共（马列）阿萨姆邦委的决议（1973年10月27日）。
80.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的一封信》《列宁全集》32卷，505页。
81.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278页。
82. 毛主席：《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83.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85. 《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1935年2月）引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6.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369页。
87. 毛主席电复印共总书记（1949年11月19日）。

（写于1978年5月）

依赖“国际领导”、崇信修正主义 “权威”对印度革命的影响

王 朴 安

印度革命长期以来为什么就是起来不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是：在印度共（马列）成立以前，印度共领导一直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制定出各个时期内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作为印度革命的领导者，印度共产党本来应该一方面接受和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同时应该认真对待别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印度本国具体情况，总结印度革命具体实践的经验教训，反对盲目依赖所谓“国际领导”。但是印度共历届领导人的表现恰恰与此相反，它们背离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而依赖错误的“国际领导”；拒绝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歪曲中国武装革命的经验，而崇信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权威”。结果不能不使印度革命事业遭到巨大的危害。

一、背离伟大导师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思想指导。

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开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印度人民反英民

族解放斗争空前高涨，印度工人阶级也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九二一年后，印度开始出现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团体产小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同国际共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十分关心印度的革命并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列宁在一九二〇年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及他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强调要“正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指出“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各国党“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等等¹，为印度革命指明了方向，为印度共运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思想 and 理论基础。

但是作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马·纳·罗易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却顽固地反对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关于应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又绝对保持独立性的提法，提出了他自己的《补充提纲初稿》，认为共产党人不能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只能单独发展他的所谓“阶级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²

在后来为他的主张辩护的文章中，罗易强调印度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印度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³他硬说“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新经济政策加剧了阶级分化，使阶级斗争达到成熟阶段，……以资本主义的矛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印度民族革命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民族革命只有

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藩篱才会获胜”⁴。一九二八年，罗易提出了他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根据罗易的看法，非殖民化产生自帝国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各个帝国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殖民地作出让步，允许他们实行工业化”⁵。他断言，由于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印度已产生了一个从事制造业的资产阶级。……随着这个新阶段的成长，它要求帝国主义者让步，……这样，新兴资产阶级便更接近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出现了“非殖民地化”——罗易这种观点是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同托洛茨基主义相一致的⁷。

在印度共运创始阶段，罗易的错误观点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曾被印度共产党人当作“圣经”。印度共运未能迅速走上轨道，同罗易对列宁指导的公然违抗有很大的关系。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曾投入国大党怀抱，最后堕落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但是罗易的“非殖民地化”论在党内的流毒是很深的。印度《解放》月刊的一篇文章在评价印度共历史时说：“罗易死了，但是他阴魂不散。非殖民地化的理论在新的打扮下出现了”⁸。一九四八年后兰那地夫集团实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把印度社会看成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实际上是“非殖民地化”论的复活。目前丹吉集团的修正主义分子称印度是“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同样是贩卖“非殖民地化”的黑货。同上的文章还指出：“……印度共的领导人，如丹吉、约希、兰那地夫、高士、艾哈迈德、南布迪里巴德和孙达拉雅，所有的人都继承了罗易的理论，这个理论四十年来统治着党、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有时表现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有时表现为极左主义。党的领导从来没有摆脱罗易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遗产”⁹。

印度共背离列宁的教导，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是陷入右倾投降主义，便是采取“左”倾关门主义。一九三五年后任印度共总书记的约希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九三九年初，当国大党内部以甘地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同激进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约希采取了投降主义路线，支持以甘地为首的右派势力，“要求在甘地指导下的领导”。¹⁰约希集团还声称，它的工会运动方针和罢工策略应当“取得国大党各级委员会的合作和支持”为基础，任何“左倾的立场”“都完全是一种分裂活动”。¹¹到了一九四〇年三月，约希却重复了罗易的滥调，说由于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占了领导地位，所以“现在就没有什么民族斗争”，因此约希宣称要“压倒和孤立软弱的资产阶级”。¹²但在一九四二年，约希又发展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约希集团无耻地宣称，“留在我们的伟大爱国组织（指国大党）之内，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你们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民族运动的可敬领导，……它受到我国宝贵的民族遗产……是鼓舞我们为印度的自由同爱国同胞并肩作战的活的力量”。¹³约希自己后来招认，“他的错误的根沅，归根结蒂就是他自己否认了马列主义所致”。¹⁴

一九四八年继约希任印度共总书记的兰那地夫同样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修改了共产国际文件和公认的马列主义学说”，¹⁵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他根本违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矛盾的分析，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一个矛盾仍留存着，这便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¹⁶他歪曲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中的两个环节这一列宁主义概念，说什么这两个革命“互相连结”、“互相交织”，印度革命是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

的“两个阶段的合并”，是“两者的混合”。¹⁷约希、兰那地夫等方面背离列宁的教导，另一方面却寻找和依赖错误的“国际领导”，结果把印度革命运动引入了邪路。

二、依赖“国际领导”作靠山来进行宗派斗争。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创立初期即同国外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共运的倡导者罗易本人就在共产国际担任过重要职务，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期间负指导印度共运的实际责任。但在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通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国际支部应同各该国殖民地之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以后，英国共产党即于一九二五年初成立了“殖民地委员会”和“印度局”，开始过问印度共运事务，并多次派遣干部到印度与共产党人联系。一九二六年末和一九二七年赴印的斯普拉特和布莱特雷是特别重要的人物，被认为是当时“印度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¹⁸同时英共帕姆·杜德于一九二六年出版了具有指导性的《现代印度》一书，使他“俨然成了印度共产党人的顾问”。¹⁹

英共在早期的印度共运中无疑地起了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斯普拉特自述他的任务是帮助印度共“组织一个能够合法掩护共产党活动的工农党”。²⁰有人认为：“在斯普拉特和布莱特雷的领导下，印度共运以印度人自己无法取得的速度开展起来”²¹，“并在组织工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²²但与此同时，当时印度共领导人由于未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一种盲目依赖“国际领导”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曾在印度共产党内延续了数

十年，给印度共运的开展造成巨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印度共运在其早期即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合法主义和工团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同它的依赖国际领导不是没有关系的。

尤其严重的是，印度领导人一开始就陷入了争夺权力的宗派斗争中，他们往往拉“国际领导”作靠山，来巩固自己一派的地位，或者同其他派别开展斗争。早在一九三〇年，党内宗派斗争激烈，密拉特狱中的“老卫兵”和在狱外的新的领导发生矛盾。“狱内的领导也有不同的宗派，正如同狱外的派别一样”，“丹吉和阿迪卡利从狱中煽动着（狱外的）兰那地夫和德斯班迪的两个对抗着的集团”。²³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于是同当时也在狱中的斯普拉特和布莱特雷一起，向“国际领导”汇报，呼吁“国际领导”发表一封公开信，来“调解孟买的敌对集团之间的分歧”。实际上艾哈迈德企图通过这样的手法，在“国际领导”支持下巩固他的三人小集团（艾哈迈德、卡特、卓格雷加尔）²⁴在党内的地位。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英共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帕姆·杜德以及本·布莱特雷曾代表印度共同当时在莫斯科的国大社会党领导人米诺·R·玛萨尼会谈，提出印度共同国大社会党联盟的问题²⁵。一九三六年发表在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杜德——布莱特雷提纲》，事实上是一个指导印度革命的文件。《提纲》认为印度国大党还不是“印度人民进行民族斗争的统一阵线”，但是它“能够在实现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中起巨大的带头作用”，而且，“如果把它的组织、纲领和领导进一步改造的话，它甚至可能成为实行反帝人民战线的组织形式”。²⁶《提纲》还认为从内部来改造国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的任

务。根据“提纲的精神”，印度共总书记约希不顾当时一般党员不愿加入国大党的抵触情绪，命令印度共党员加入国大社会党²⁷。约希领导下的政治局一九三七年二月决议，认为反帝统一战线“甚至还应包括印度工商业者的某些组织”。²⁸但是沒有明确分析这些“工商业者”是民族性的或买办性的，因此在党内造成了混乱，并召致了国大社会党的谴责，说共产党人是修正主义者。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帕姆·杜德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印度人民、爱尔兰人民以及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象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一样，是和反法西斯主义各国人民的胜利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利益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统治者可能答应或作出什么让步”。²⁹这就意味着，不论英帝国主义给不给印度人民以自由，印度人民都必须支持英国殖民当局的战争努力。这样就给英帝国主义以借口，来任意剥削和压迫印度人民。英共的观点，对后来印度共的行动和言论有重大的影响。

一九四二年三、四月，英国派克利浦斯代表团来印，同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谈判，印度共政治局立即宣布赞成克利浦斯代表团方案，呼吁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克利浦斯建议的基础下求得解决办法”，并保证全力支持这种解决办法”。³⁰

在克利浦斯代表团来印不久，印度共还散发了一篇“致朋友和同情者”的声明说：“今天所有的共产党人，无论是狱里的，还是狱外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处在地下的，都怀着热切的愿望，愿意竭尽全力协助目前的战争努力……即使英在现有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也在所不辞。”³¹印度共要求英殖民当局取消对其党员和出版机构的一切限制，而印度共则

答应推行一项非常的“工作计划”，如参加宣传运动，推动服兵役的工作，为军队提供医疗及文娱活动人员，征募敢死队，发动大生产运动等等。印度共还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表示“只求我们共产党人力所能及”，要求英殖民当局宣布印度共合法，释放狱中印度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五月，印度共召开一大，通过了“关于在保卫祖国与争取建立国民政府的行动中团结起来的决议”，说“今天摆在印度人民面前的最高任务是保卫祖国”，“我们应该团结人民反对暴动”，“团结起来防止抢劫粮食的暴动”，“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增加生产”，“实行百分之百的联合主义是实行为军队与人民而生产这个口号的重要杠杆。共产党员应该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罢工”。“必须把增产粮食的爱国口号作为所有对农民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基础”等等。兰那地夫在一大的报告中说：“有条件地支持生产”是一种“左的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工人的生活是“地狱般的”，“难以忍受的”，“也应该坚决防止罢工”。他建议成立雇主、政府、工人三方委员会来处理生产中的问题。³³约希说：比起生产运动来，“其它一切都是空话”。³⁴约希不是根据印度革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当前的政策方针，而是盲目依赖“国际领导”，以致无条件支持英殖民当局的一切战争努力，丢掉了民族独立旗帜，走上了民族投降主义的道路。印度共这时已经同国大社会党、鲍斯派等激进派公开决裂，甚至把他们称为“第五纵队”，³⁵使自己更加孤立。

大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三月帕姆·杜德以《工人日报》特派记者身份随英政府内阁代表团来印，亲自为国大党和印度共的“和解”出力，并提出了一个“宪政方案”，“建议成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中央制宪议会，它拥有决定印度

宪政体制的“最高”权力。在召集之前，英国应把权力移交
给一个临时的印度政府，它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代表在
平等基础上组成，如果办不到，就由国大党单独组成。”³⁶
杜德提出“宪政方案”之后，印度共于四月十五日向内阁代
表团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选举中央制宪会议，由国大党和
穆斯林联盟组成印度临时政府³⁷，同杜德建议一模一样。两
个建议都使印度共把自己放在替国大党抬轿子的地位上，完
全放弃一个革命党应起的作用。

为了当“效忠的反对派”，约希集团竟不惜压制前些时
候它自己支持的群众运动，如孟加拉的“三一交租运动”。
一九四七年秋，印度共领导人之一波瓦尼·森说：“我们呼
吁农民今年不要象去年那样采取直接行动”，新政府“一定
要有通过法律途径履行其诺言的机会”。³⁸

约希对兰那地夫进行派别斗争时，他也依赖“国际领
导”来巩固他的领导地位。约希在印度共二大作检讨时承认，
当一九四八年需要对印度的“独立”有一肯定的看法的时
候，他就等待从英国带回来的文件，然后“坚持这些文件”，
不同意说它们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而且“用改良主义的
逻辑制出英国式的文件：动员起来支持国民政府；要求执行
国大党政策而宣传民族复兴运动”。³⁹

约希是国际上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者，他自己承认：
“我是右倾改良主义偏向的领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它
的思想根沉在于公开否认马列主义及尊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国际方面将社会民主党观念的影响输进到党内来”。⁴⁰

约希被开除出党后，为了继续进行宗派斗争，发行刊物
向外国共产党申述他的观点，呼吁“国际领导”“坚决地和
尽可能迅速地进行干预”。⁴¹约希的做法后来得到杜德的支

持。

一九五〇年六月，拉哲斯瓦尔·拉奥继任总书记后，给英共寄去了一封信和附件，想取得英共的支持。但是英共政治委员会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给拉奥的复信，反而批评印度共新领导“曲解《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社论”，认为不应该“把在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的总路线”，说这导致了“新的冒险主义”，这是党目前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又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的很严重的试验”，“必须立即急迫着手进行这次选举的准备工作”；同时指示印度共改组领导机构，撤换领导人员。⁴²拉奥对英共来信的意见，既不敢反对，又不敢把它向党员公布，而把它扣压了三个月之久。

一九五〇年秋天，印度共在孟买的总部党组已成为党内反对派进行派别斗争的中心，发行了一份叫做《总部党组公开论坛》的不定期刊物。同年十月，高士为了反对拉奥，在这个不定期刊物上刊登的一篇讲话，呼吁“国际领导”表态，他说：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印度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能解决这一危机。正是国际上的同志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只有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同国际上的领导人取得联系……。⁴³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帕姆·杜德对印度共《十字路》编者五个问题的答复，实际上是替印度共草拟了新时期的政策提纲，它大谈印度和平运动的重大作用，认为当时尼赫鲁有脱离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若干迹象，是国际形势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主张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主阵线”，以便“实现根据成人普选权来进行选举这一要求”，“向人民提出一个联合的政治领导来代替目前占统治地位的

反动的政治领导”，这实际上是明确主张印度目前应该放弃暴力革命的策略，走上“议会道路”。

英国共产党反对印度共坚持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原不足为怪的。英共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利物浦召开二十一大，修改和通过了党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波立特在为纲领作的序言中说道：“英国将沿着它自己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英国共产党人宣告：英国人民能够把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一个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机构”。⁴⁴这个纲领宣扬“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宣扬“不进行内战”，“不搞武装起义”是“最有利的道路”。⁴⁵

一九五〇年底，孟买党总部派了戴文和巴耳·克里希纳两人到伦敦与杜德接头，英共来信最后落入了由高士、丹吉、卡特等控制的孟买党总部党组之手。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孟买党总部全体党员会议专为政治局扣压英共来信作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大捧特捧英共为“国际权威”，它说：“由于以哈里·波立特和杜德两位同志为首的英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占的重要位置，由于杜德同志在殖民地问题和印度问题上，具有一种杰出的、国际的权威地位，由于杜德同志的文件往往成为印度世世代代的革命者的灯塔，由于每当我们党面临着危险的时候，英共所给予我们的不可估量的帮助，以及由于英共的提议，共产党情报局发表了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那篇社论，来干涉我们党的政策，并给予了旧领导方面的托洛茨基——铁托主义路线一次打击，因此英共中央委员会在这封来信中所提出的干涉，是我们党的生命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⁴⁶

一九五一年初戴文和巴耳·克里希纳同帕姆·杜德的谈

话》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件。⁴⁷在谈话中，杜德说他希望将英共来信在印度共党员中传阅。他说印度革命“最后”必将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但是他不相信安得拉省（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认为不能把“安得拉的经验”运用于全国，否则“结果只能是悲惨的”。杜德说印度必须采取“中国道路”，但又强调“印度情况同中国有若干根本的不同点”，不能进行机械的类比，必须详细研究印度的“特殊性”，才能规定“正确的斗争形式”。杜德特别强调和平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杜德——布莱特雷提纲”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印度情况上的应用，同时认为约希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期间工作干得很好，有了“重大的成就”。杜德表示支持高士、丹吉、卡特三人反拉奥路线的意见书，还批评它右得不够——“害怕被谴责为修正主义者，因而对左倾宗派主义让步。杜德还支持约希被开除后公开办杂志向党进攻，并主张不加调查就立即恢复被开除党员的党籍。这次最露骨地干涉印度共内政的杜德谈话，无疑地为一九五一年四月发表的印度共《政策声明》定下了基调。

高士任总书记后执行的路线政策基本上符合杜德的调子，高士、丹吉集团就这样依赖“国际领导”的“权威”，结束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一九五三年英共总书记哈里·波立特亲自来印度参加印度三大，波立特在印度的讲话，强调印度“具有最好的工业基础”，印度共应在农民以外“争取到新的同盟者”，要“加强工会运动”，“宣传一种产业一个工会，全国一个总工会的思想”。波立特还鼓励听众“带着有一天要当印度共总书记的感情来工作”。⁴⁸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整整三十年中，印度共和英共的关系，一面是盲目依赖，另一方面是积极干

予，这构成了印度共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巨大的特点。

三、抛弃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歪曲中国革命的经验。

第二次大战后，印度出现了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大约从一九四五年起，印度共的基层党员开始“自动地领导人民斗争”。⁴⁹一九四六年二月，孟买爆发了海军起义和人民支持起义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六月，特仑甘纳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斗争。“可是中央发觉革命斗争的存在……还是一九四六年七、八月的事情”。⁵⁰这充分证明：向来依赖“国际领导”的印度共中央领导集团是如何地脱离群众，脱离印度革命的实践；而具有革命觉悟的基层党员和工农劳动人民又是如何地渴望走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薄弱环节，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给印度特仑甘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人民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安德拉省委书记处在讨论和起草《意见书草案》时，就被中国战争的节节胜利所鼓舞，而认为印度“斗争的过程，道路及形式是与中国的相类似的……”。⁵¹这一提法，反映了印度人民特别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地区人民要求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共同愿望。

一九四九年七月起，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连续刊登了毛主席以及朱德同志等总结或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专文及社论。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给印度共总书记的复也

指出：“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和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羈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国情报局机关刊发表了《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着重指出：对于印度等殖民地附属国家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帮助它们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忠实朋友和可靠堡垒”。⁵²一九四九年末在北京召开了亚澳工会代表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七日，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了《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展》的社论，肯定了“中国人民……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明确指出印度共产党应“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来进行斗争。所有这些都给印度革命运动提供了接受中国革命胜利经验，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大好条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共领导集团尽管对英共、南共等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而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则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一九四九年后，兰那地夫集团仍坚持其“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继续宣扬在印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什么“全印工会已经能够……动员工人们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有决定意义的斗争”。⁵³在给一位政治局委员的信中他还坚持说他发现亚澳工会代表会议《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中号召“工人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荒谬的提法”。⁵⁴后来印度共的一个文件评论说，兰那地夫的政治局“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革命及民族问题上，抛弃了一切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导；歪曲日丹诺夫的报告；

无视兄弟党的宝贵意见的文章；拒绝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丰富经验学习，……”“政治局的路线，它的实践……，使

党与各种群众运动受到重大破坏和濒于消灭”。⁵⁵印度共一个文件指出，当安德拉省委于一九四八年说印度斗争的远景和过程与中国相似时，兰那地夫集团“不肯正视中国斗争中新的事物并从中国的斗争学习。它顽固地坚持已定的斗争形式，即总同盟罢工及全国武装起义的形式……”。⁵⁶“对曾胜利地领导强大的中国解放战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了诽谤性的攻击”。⁵⁷从世界革命的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而兰那地夫却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社会同沙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等同起来，把中国革命经验同十月革命道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拒绝中国经验，而硬说：“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对于印度也完全适用”。⁵⁸

接替兰那地夫任总书记的拉哲斯瓦尔·拉奥是前届政治局委员，他接受了旧政治局的三个“左”倾冒险主义的文件，本身就是旧政治局中的一个“机会主义的投降者”。⁵⁹早在一九四八年，当国大党军队进入海德拉巴邦，企图扑灭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烈火时，拉奥等人就曾经竭力主张“改变政治路线”和停止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⁶⁴这个“誓称要走中国的道路”，打着路线斗争旗号的拉奥爬上总书记宝座后，所推行的把“全国变成”“特仑甘纳”的新路线，在本质上同兰那地夫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旧观点“绝没有不同的地方，只是从城市转移到乡村而已”。⁶⁰拉奥的新中央在给特仑甘纳战士的贺电中说：“中央委员会保证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全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孤立作战的现象的消

除（就是你们单独进行武装斗争）只是一个以日和月来计算的时间问题”。⁶¹这种说法，暴露了拉奥根本不认识农民武装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以及群众觉悟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说明了拉奥并不是真正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央委员会的《告党员书》把凡是进行任何封建剥削的富农都看作是“这阵线的敌人”，实际上，这种看法不但将排斥几乎一切的富农……而且把许多中农划入富农之列”。“同样的倾向在处理与中等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上也显露出来。中央委员会说“中等资产阶级的若干部分，虽然本身力量并不大，但是与封建势力或资产阶级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因此都是革命的敌人”。⁶²这实际上是“以武装斗争为名否认了统一战线的需要”。⁶³另一方面，拉奥上台后，即受到高士、丹吉等党内右派势力的攻击和国际上英共的批评，因而对主张“议会道路”的机会主义路线，采取从妥协到投降的态度。以拉奥为首的政治局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发表的政策声明草案宣布对大选采取“积极态度”，声明在原则上不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来推进革命事业”。同时欺骗党员和群众说，“参加选举的政党和集团可以……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游击斗争”。⁶⁴印度共中央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没通过关于大选的决议，“要求立即举行大选”，提出“以代表民主力量的政府代替现政府”的口号作为竞选纲领。⁶⁵

以上事实说明，在由高士、丹吉、拉奥、巴萨瓦潘奈亚四人组成的印度共代表团于一九五零年底到莫斯科去以前，印度共领导集团内在参加大选这一点上已经有没任何分歧。如果说拉奥和巴萨瓦潘奈亚同高士、丹吉之间没存在什么争论，至多不过是后者干脆主张放弃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而前者则“发明”了马列主义宝库中从来没有、革命斗争实践也从未

出现过的所谓“武装斗争”与选举运动同时并举的梦话。

当时基层党员和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战士都不愿意放下武器。已经有了英共作靠山的印度共四人代表团于是去苏联，希望从斯大林同志那里得到关于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肯定性指示意见，来压服党内外持不同意见的人。

当时苏共和斯大林同志是支持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正确地指出：特仑甘纳是“在印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尝试”，是“农民革命的前驱”。⁶⁶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号起陆续刊登了一些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专文或社论。所以，当印度共四人代表团要求斯大林就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问题表态时，据印度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巴萨瓦潘奈亚的说法，斯大林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保卫和推动特仑甘纳的斗争”，深为“遗憾”；至于“坚持武装斗争还是停止武装斗争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这“需要由印度共中央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⁶⁷另根据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直接领导人之一文卡特斯瓦拉·拉奥的说法：“当时我们得到的报导（当然是口头上的）是：当斯大林同志详尽地研究了武装斗争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对印度代表团建议：“输送更多的武器，更多的干部以及在战斗区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在同代表团进行的一次较早的会谈中的第一次建议。后来，当代表团再次催他指示武装斗争应该怎么办时，据说，他曾经说：“你们不能够捍卫这个斗争，这是遗憾的”，而没有再说别的了。⁶⁸可见，斯大林并没有规定印度共必须停止武装斗争。而高士等回国后，公然歪曲斯大林指示的精神，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强迫命令基层党员和武装战士结束了特仑甘纳的武装斗

爭，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这种出卖革命利益的罪行，只能全部由印度共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分子负责。

高士、丹吉等人竭力反对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走农民武装斗争的道路。他们歪曲中国的经验，说国共分裂时“三万军队参加了革命队伍”，所以才掀起了武装斗争，而印度是不能同中国相比的。⁶⁹一九五一年印度共“政策声明”同样歪曲中国的经验，完全抹煞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滇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而强调“当中国党开始领导农民进行解放斗争时，它已经有了一支从一九二五年革命分裂出来的军队”。它完全抹煞毛主席粉碎蒋介石军队“围剿”的正确战略战术，而强调“中国没有统一的优良的交通网，这使敌人不能对解放军进行集中的迅速的打击”。更荒谬的是，它完全抹煞毛主席的正确和英明的领导，我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以及解放军的英勇战斗等等，而胡说什么“中国的红军，直至它到达东北之前，一再被包围着并受着消灭的威胁。中国解放军在东北有着工业基地，而背后就是伟大的友善的苏联，后方没有遭受任何进攻的可能性，他们整顿了一下，就发动了最后的攻势，而达到胜利”。高士、丹吉集团认为印度有它的“特殊情况”，所以“单单遵循中国道路的农民斗争，在印度是不能达到胜利的”。

从印度共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领导集团——一开始就背离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指导，随后又盲目信赖英共的“国际领导”，进一步抛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歪曲和抵制中国革命的经验，那么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它的堕入现代修正主义的怀抱，已经成为合乎逻辑的必然趋势。

四、“崇信修正主义的国际权威”。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利用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威信，对其他国家共产党挥舞指挥棒，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放弃革命来服从他们同美帝实行“和平共处”的反革命需要。印度共领导集团的高士、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孙达纳雅等人，本来就是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从宗派斗争利益出发，初时依赖英共的“国际领导”为靠山，现在则进一步卖身投靠，崇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国际权威”，服从它的指挥，对尼赫鲁政府实行阶级投降主义。

一九五四年六月，印度共领导集团内部围绕着“谁是印度自由的主要敌人”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相持不下时，高士乃于七月末赴苏“治病”。十二月初，高士从莫斯科回到印度，《新世纪》立即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共产党给尼赫鲁的答复》，改变了他在一九五一年印度共三大作报告时全面批评尼赫鲁政府的调子，转而支持尼赫鲁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和平方面”，但仍表示“在国内要同反动政策作无情的斗争”。⁷⁰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真理报》发表庆贺印度独立日的社论，不仅赞扬尼赫鲁的对外政策。而且赞扬了他的对内政策。同年六月，尼赫鲁访问苏联。正在这时，印度共中委会开会讨论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辩论了整整一个月才通过了一个冗长的政治决议，在对尼赫鲁政府在国际所起作用的评价以及对这个政府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陷入了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的地位。高士的“旧病”复发，于七月初再次赴苏治病，九月初才回印。同年年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印度。一九五六年四月，印度共召开四大，党的路线明显地按照苏修“国际权威”的要求向右转，四大政治决议宣称：“政府采取的加强民族独立和国民

经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垄断资本的每一个步骤都将得到我们最有力的和毫不吝嗇的支持”。⁷¹决议还赞扬国大党是“具有反帝和民主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认为“国大党内部以及在追随国大党的群众中间，也产生了激进的和民主的情绪”。⁷²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了“三和”修正主义黑货，作秘密报告，丑化斯大林，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高士率领的印度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回印后，高士集团跟着赫鲁晓夫的调子，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和七月用印度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两次发表反“个人迷信”的决议。一九五六年八月，高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宣布“印度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⁷³一九五七年印度共在喀拉拉帮选举获胜，成立了由印度共执政的邦政府，苏修和高士集团都大喜若狂，认为树立了和平过渡的样板，高士等人于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印度共五大上，公开抛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在党章《序言》中规定“印度共产党力求用和平方法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和社会主义”。⁷⁴高士再次阐明“今天在印度已经有可能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下，通过议会，采取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⁷⁵

早在一五六年七、八月，苏修《新时代》杂志刊登一篇主要谈印度的文章，题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硬说在苏修帮助下，印度用不着暴力革命就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高士还不敢赤裸裸地赞同苏修这个观点，仍然认为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又含糊地承认：“对印度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存在的”。⁷⁶一九六〇年，苏修悍然不

顾我党及其他马列主义党的反对，硬把这一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黑货塞入《莫斯科声明》，而高士当时参加了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准备工作，已成了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了。

关于所谓“民族民主国家”的概念，丹吉集团的死硬分子莫希特·森声称，印度共于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这一纲领，它的分析与《莫斯科声明》的相同。⁷⁷高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即提出不排斥国大党的所谓“全民的民主阵线”的口号，并说当这个阵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可以提出所谓“更换现政府”的任务。⁷⁸高士心目中的新政府至多不过象今天喀拉拉帮丹吉集团同国大党建立的联合政府，即所谓“民族民主国家”。苏修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民族民主国家”的口号以后，高士等人便把修正主义“国际权威”的黑货当作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丹吉等人把它列入了一九六一年印度共六大的党纲草案中，六大是印度共党内宗派斗争异常激烈的一次大会，苏修派苏斯洛夫带领代表团参加，为丹吉叛徒一派打气，在会上大谈印度已经走上“自立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永远成为独立国”，⁷⁹来掩饰印度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一九六一年高士访问莫斯科回国后，于十一月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反华声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印度共全国委员会通过指责“中国侵略”的反华决议。印度共领导集团中的修正主义分子，至此完全堕落为苏修和印度反动派的帮凶。

叛徒丹吉是利用苏修联印反华，才得以巩固他在印度共的统治地位的。因此，他更是崇信苏修的“国际权威”，死心塌地充当苏修指挥棒下一名反华、反共、反人民的走卒，当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同以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

修正主义者展开大论战时，他压制党内的反对意见，倒入苏修怀抱，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世纪》周报上全文公布了苏共《公开信》，并以印度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发表《声明》，吹捧苏修《公开信》是“原则性文件”，同时攻击中共的信是“侮辱性和毁谤性的”，声称印度共完全赞同苏共立场。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丹吉在苏共二十三大会上致贺词时说：“你们党的代表大会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⁸⁰在谈到民族解放斗争和苏联的联系时吹捧苏修说：

“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不能忘记，它他应如何报答你们的党、政府和人民”。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苏修、丹吉集团代表团联合声明，吹捧“苏联在反帝、支持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各国人民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说“苏印友好和合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已获得解放的国家之间平等国际关系的榜样”⁸¹。

孙达拉雅集团吹嘘自己在国际共运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尽力捍卫马列主义，反对右的方面（苏联修正主义）和左的方面（中国教条主义）的进攻”⁸²，表面上不偏不倚，采取中间路线，实际上拜倒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脚下，为它辩护。它指责“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左派政党集中火力攻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⁸³。它硬说苏修不是社会帝国主义，说苏修侵捷是“挽救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孙达拉雅一九七四年一月的文章重申反对我党“认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国家是法西斯国家”的提法。孙修集团还吹捧苏修的“社会主义经济”给许多新解放国家以“有价值的援助”，帮助它们“摆脱新殖民主义的魔手”，说苏修对印“援助”和印苏条约使印度“减少对美帝的依赖”。但是孙

达拉雅集团在吹捧和追随苏修方面，还没有丹吉集团那么露骨，也没有直接参加苏修指挥下的所谓“国际大家庭”，因此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总之，两个修正主义集团都成了苏修和印度反动派的工具，印度革命的绊脚石。

印度共（马列）成立以来，坚决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不断揭露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印度共（马列）八大通过的党纲党章中，强调印度是处在美帝、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四座大山的重压下，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处理它同国际共运关系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如说“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⁹²中国共产党是印度共的“国际领导”，⁹³这些提法是错误的，并且产生了有害的效果。至于产生这些错误提法的原因，可能主要由于未能真正做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印度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产生一种依赖思想。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没有能同过去数十年中盘根错节的宗派斗争的习惯势力完全割裂，为了拉山头，争正统，不免仍想找个“国际领导”做靠山。目前这些错误提法在共产党革命派内部已经受到批判，但真正的肃清仍将有赖于搞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清除宗派斗争的遗毒。

注：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125、129、210、211等页。
2. 罗易：《民族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初稿》，参看G·阿迪卡利：《印度共产党历史文件》第188页。
- 3.4. 罗易：《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转引自奥

- 佛斯特里特等《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4页。
5. 巴巴尼·森·古普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印度》第四章：马·纳·罗易和共产主义。
 6.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3页。
 7. 参看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第26节，载《共产国际文件》北京编译社译第一卷第299—300页。
 8. 班迪·阿里·汗：《对印度共产党历史的新评价》印度《解放》月刊一九六八年五月号第47页。
 9. 同上《解放》月刊一九六八年二月号第六十九至七〇页。
 10. 《民族阵线》1939年3月19日，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68页。
 11. 《新世纪》杂志1939年5月，同上书第170页。
 12. P·C·约希：《政党和政治斗争真相》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225页。
 13. 1942年印度共给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公开信，转引自同上书第212—213页。
 14. 《印度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综述》印度共政治局一九四八年三月。
 15. 16. 《关于印度共产党党内左倾偏向的报告》一九五〇年五月印度共政治局修正批准。
 17. 《论人民民主》印度共政治局，一九四九年一月。
 18.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90页。
 19. 同上第83页。
 20. 斯普拉特：《炸毁印度》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87页。

21.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90页
22. 同上第124页
23. 班迪·阿里·汗：《对印度共产党历史的新评价》，《解放》月刊，1968年6月号第123页
24. 见《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25. 米诺·R·玛萨尼：《印度的共产党》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59页
26. 帕姆·杜德与本·布莱特雷：《反帝人民阵线》，《国际新闻通讯》，1936年2月29日，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60页
27. 同上第162页
28. 《共产主义者》1937年3月第5页，转引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第164页
29. 帕姆·杜德：《每月评论》《劳工月刊》，1941年9月第381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194页
30. 《党内通讯》1942年4月6日第3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204页
- 31, 32.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33. 兰那地夫：《工人阶级与国防》第34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217页
34. 米特拉编：《1943年印度年鉴》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218页
35. 《关于在保卫祖国与争取建立国民政府中团结起来的决议》1943年5月印度共一大通过。
36. 杜德：《印度与巴基斯坦》92—93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239页
37. 备忘录全文载米特拉编：《1946年印度年鉴》220—

- 222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240页
38. 《人民世纪》1947年10月30日第10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264页
 39. 约希：《我的错误》1948年12月18日
 40. 印度共《中央委员会关于约希反对开除党籍的申诉的决议》，1950年6月5日
 41. 约希：《致外国同志书》，《观点》杂志，1950年5月
 42. 《英共政治局委员会给印度共的信》1950年9月7日
 43. 高士：《论“关于我党目前形势的意见”》第9页，转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302—303页
 44.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78期，1951年3月3日出版
 45. 《孟买党总部全体党员会议关于政治局扣压英共致印度共信的决议》1950年12月7日
 46. 孟买“民主研究社”出版《1950—1956年印度共产党文件》第31—70页
 47. 印度《新世纪》月刊，1954年7月号
 48. 《印度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综述》
 49. 《关于印度共产党党内左倾偏向的报告》1950年5月
 50.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1949年12月10日第9期
 51. 《高士、卡特对旧政治局文件的批评》1950年5月
 52. 《新中央委员会给全体党员和同情者的信》1950年6月
 53. 《关于印度共产党党内左倾偏向的报告》1950年5月
 54. 同上
 55. 高士、丹吉、卡特：《论党内目前形势》1950年9月

56. 拉·拉奥《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仑甘纳斗争及从其丰富经验中吸取的教训》《新世纪》月刊，1972年9月10日
57. 高士、丹吉、卡特《论党内目前形势》1950年9月
58. 印度共中央委员会《给特仑甘纳战士的贺电》1950年6月17日
59. 高士、丹吉、卡特《论党内目前形势》1950年9月
60. 《东旁遮普省委书记处关于中央给党员的信的意见书》1950年10月13日
61. 《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与印度共产党》1950年11月
62. 《印度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大选的决议》1950年12月
63. 巴布拉谢维奇《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经济问题》1949年第8期
64. 巴萨瓦潘奈亚《特仑甘纳斗争的历史经验》《自由报》1972年11月18日
65. 文卡特斯瓦拉·拉奥《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的道路》第26页
66. 高士、丹吉、卡特《论党内目前形势》1950年9月
67. 高士《共产党给尼赫鲁先生的答复》《新世纪》1954年12月5日
68. 《印度共四大政治决议》《印度共四大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7年版第5页
69. 《新世纪》周报1956年5月20日
70. 《新世纪》周报1956年9月2日
71. 《印度共产党党章》1958年5月出版
72. 高士：《关于党章》《新世纪》月刊1958年4月号
73. 高士：《论印度的发展道路》《新世纪》月刊1956年

10月号

74. 莫汉·拉姆：《毛主义在印度》第28页
75. 高士：《关于统一战线》《新世纪》月刊1956年2月号
76. 《新世纪》周报1961年4月23日
77. 1966年4月5日丹吉在苏共二十三大会上的发言
78. 1972年6月30日丹吉集团与苏修的《联合声明》
79. 1972年6—7月印度共（马）九大通过的《工作报告》
80. 1973年印度共（马）中央委员会政治经济形势报告
81. 1970年4月22日《人民民主》周报纪念列宁诞辰百周年特刊
82. 《人民民主》周报1974年1月13日
83. 印度共（马）政治局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贺词，
《人民民主》1973年11月4日

（写于1974年）

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 领导权对印度革命的影响

陈 峰 君

无产阶级能否掌握革命领导权，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然而，印度共自成立以来，经常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地位和权力，他们没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本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没有把革命的最主要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帝旗帜；他们不重视农民工作，没有领导农民为实施一个革命的土地纲领而斗争；他们没有正确对待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在统一战线中不是实行独立自主原则。由于这些原因，印度共产党在“独立”前和“独立”后都没有能够掌握革命领导权。这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印度革命就是起来不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放弃反帝旗帜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是否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是斗争大方向的问题。抓住这个大方向乃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过去印度共领导人恰恰是背离了这个斗争大方向。他们要么把主要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把反帝斗争搁置一旁；要么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同帝国主义联合，丢掉了反帝旗帜；要么把资产阶级右派看

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印度共理应积极参加并领导印度人民把英帝国主义者赶出去的运动，并以此来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印度共领导却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取代了曾一度提出的所谓“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约希等人竟向英国当局保证：“愿意竭尽全力协助目前的战争努力”“即使在现有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也在所不辞”，并且“将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⁶。为了贯彻这一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线，印度共“一大”以后在约希的领导下掀起了所谓高于一切的“生产运动”。约希声称，“比起生产运动来，其它一切都是空话”⁷。二次大战结束后，约希又马上提出所谓“和平发展到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理论⁸。他们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扬言“通过与英国工党的联盟和联合国的支持“获得自由”⁹。他们竭力将战后印度人民的巨大反英浪潮限制到“最大的合法地位”，将人民反对英国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减到最低限度”¹⁰。他们叫喊争取“成人普选权”、“实现制宪会议”，妄图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发展到独立和社会主义”。甘地、尼赫鲁正是利用了印度共的这一致命弱点窃取了反英运动的领导大权，充当了反帝的“英雄”。尼赫鲁在1946年洋洋得意地攻击印度共时说：“由于它的叛卖政策，它已在群众中陷于孤立”。¹¹

印度在取得“独立”之后，印度共本应正确认识印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独立自主地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把矛头直指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国大党政府。反帝和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府是一致的。但是，在四十年代末，领导印度共的兰那地夫集团实行“左倾”机会主义，又重犯了罗易的错误。兰那地夫认为“实现民主革命的

每一步骤，都带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消灭资产阶级统治”。而所谓“反帝斗争”是指“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指脱离某个帝国主义¹²。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印度共同样没有能够利用独立初期的革命形势，领导人民掀起反帝运动的高潮，反而在大城市中实行盲动主义政策，使革命遭到重大的损失。

一九五一年后，以高士为总书记时期的印度共领导自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走上“议会道路”以后，反帝的调子越唱越低，直到与国大党同流合污。印度共在一九五一年《新纲领》中提出了“断绝与英帝国的关系”，“结束英国资本的控制”¹³等主张。但不过是规定了将来通过选举而成立的新政府的一些任务，并没有把反帝任务同人民的革命行动联系起来。在高士任总书记的十几年内，没有领导印度人民搞一次象样的反帝斗争，只搞过大大小小的所谓“和平运动”。一九五三年三大时高士提出英国是“自由”的主要敌人、美国是“和平”的主要敌人的口号¹⁴。实际上把二者人为分割开来。同时，强调美国是和平的主要敌人，而不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日益侵入印度，也看不见过去由英帝国主义一手培植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美帝的勾结正在日益加深，结果必然削弱甚至忽视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仅仅指出美国是印度自由独立的敌人而不指出反英帝的任务必须同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联结起来，结果以然把反英帝斗争的任务缩小到诸如“退出英联邦”“撤走英国顾问”之类的口号，企图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反对英帝，是无法把广大人民动员起来的。

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中央会议和一九五六年四大则对上述主张作了所谓“实质性与根本性的修改”¹⁵。高士明确宣布：“印度的国际地位已发生了质变。不能再把印度看成是殖民地了，不能再把印度看成是形式上的东西了”。印度已经具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性质了”¹⁶。到一九六一年六大时，高士则更加明确地宣布，印度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而且这种独立已“建立在比已往更加稳固的经济基础上”¹⁷。高士集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跟着国大党政府跑。它把尼赫鲁政府在五十年代中期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变化，看成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认为政府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政策”“一种独立的政策。”¹⁸因此印共“欢迎这一转变，认为这是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并一再宣称“支持政府的一切进步政策和措施”¹⁹。在这段时期中印度共也不时喊出一些所谓“反美的口号，但是他们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行动。在多数情况下，是尾随在国大党的后面，为国大党的假“反帝”摇旗呐喊，欺世惑众。

印度的两个修党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然更谈不上反帝问题。丹吉叛徒集团宣称印度一九四七年“独立”后就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²⁰。另一个修正主义集团则宣布一九四七年的“独立”标志着“印度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主要针对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已告结束”²¹。丹吉集团无耻吹捧苏修是“民族解放和反帝力量的最可靠的堡垒和靠山”、“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朋友”²²。另一个修正主义集团则大肆宣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把苏修称做“社会帝国主义国家。”²³丹吉集团称赞苏印条约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强有力支持。”另一个修正主义集团则吹嘘苏印友好条约是“保卫印度主权和

抵抗美国讹诈的需要”²⁴。两个修党表面上都高唱“反美”，还举行过一些反美示威，但这也正是他们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需要的表现。另一个修正主义集团表面上不象叛徒丹吉集团那样紧跟苏修，在国际共运中标榜“第三条道路”，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但是实际上它对苏修基本上是“小骂大帮忙”。它在国际上重大问题如侵略捷克、肢解巴基斯坦、印苏条约等问题上都是偏袒苏修的，它与叛徒丹吉集团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印度共放弃反帝旗帜的结果是：“独立”前，印度广大人民、爱国者的进步人士和印度共基层党员的轰轰烈烈的反英斗争的果实被国大党右派所窃取，印度人民应当享受的权力落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独立”后，印度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不但英帝国主义继续保持它的权益，而且美苏两霸势力也相继侵入印度。在几个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印度人民至今未能摆脱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

二、不重视农民工作和土地问题

毛主席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深刻地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选集》1968年横排本第1196页）通观印度共的全部历史，缺少的恰是这个“最基本的条件”。

在二十年代初期，罗易就错误地把印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他在《过渡中的印度》一书中开首就

宣称：“同一般的想法相反，印度并非处在封建制度下”。²⁵ 同托派思想相近，他鄙视农民的革命作用而只信赖所谓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²⁶。因而在罗易的影响下，印度共根本不搞农民工作，也就根本谈不上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实施革命的土地纲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表在共产国际刊物《共产国际通讯》上的《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提出要“高高升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并规定“将地主、各封建王公、教会、英国政府官吏和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森林和其他财产，无偿地加以没收，并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劳苦群众使用²⁷。但是，这个文件只是一个未经正式通过的《草案》，而且发表的时候，罗易已经被开除出共产国际，而国内的印度共组织已被破坏，印度共的主要领导人全部被关在狱中，这个文件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文件提出的这些要求反映了基层党员的革命要求，但是没有得到领导支持，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在印度共影响下“全印农民协会”提出了“无偿地废除地主制度”，“发动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土地等要求”²⁸，农民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约希等印度共领导人为适应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放弃了过去的土地纲领。印度共“一大”把“农民团结起来增产粮食”的口号作为“对农民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基础”。²⁹ 为实现这一口号，印度共领导竭力反对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他们说如果“苦口婆心”地“请求”，那么大地主“也可以被推动来参加增产粮食的运动”。³⁰

战后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印度共虽然几次更换领导，但这些领导人的共同特征是都不重视农民工作和土地问题。在约

希时期，极力把农民的土地要求局限在合法范围内，提出所谓要求“废除地主制及使耕者有其田的立法”，³¹“允许农民获得休耕地和租佃权，减收地租和地稅，救济负债的农民”等，³²约希对特仑甘纳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根本不予支持。在约希路线的影响下，领导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安德拉省委开始时也只提出“反对强迫苛稅、强迫劳役以及非法夺佃”的要求。在农民土地斗争的巨大形势下才不得不提出要求没收持有五百英亩以上土地所有者的土地³³。在兰那地夫时期，由于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由于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因此也无视农民工作和错误地对待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问题。他们提出在农村“完备的口号是，土地国有化，并由农民协会分配其使用权。”³⁴特仑甘纳地区的印度共产党革命派和革命人民突破了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框框，在解放区实行了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地租和废債、减息政策³⁵，在印度破天荒地实现了较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的标准，水田为五英亩至二十英亩，旱田为七十五英亩至二百英亩）。安德拉省委也注意到农民的土地要求，正确地提出了“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取消农民的一切债务”等口号³⁶。然而，在国大党军队进入海德拉巴邦后，安德拉省委的主要领导人极端动摇，竟主张停止武装斗争，因而又使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重新被掠夺到地主手中。以拉哲斯瓦尔·拉奥为首的中央虽然在当时形势下曾一度表示把土地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并宣告支持特仑甘纳武装斗争³⁷。但是中央和安德拉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实行工作重心的彻底转移，而且在拉奥上台不久就在党内右派压力下实行妥协，同意对议会选举持积极态度³⁸。因而他们对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并不是真正重视，更不可能用行

动来说明他们支持农民斗争的决心。拿拉奥来说，不论在他任安德拉省委书记或印度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亲自到农村去领导武装斗争。倒是后来决定出卖特仑甘纳运动，诱劝农民放下武器，放弃土地革命的时候，他却四处奔走，十分卖力。

五十年代以高士为首的印度共中央背叛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并走上“议会道路”之后，在忽视农民土地问题上越走越远。一九五一年印度共《新纲领》和《政策声明》中还提出了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的主张，对国大党政府的土地改革也持否定态度。而后来就只提无偿地没收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再后，连超过限额的土地是否要给补偿一点，也含糊过去，不敢明确提出“无偿地没收”的做法了。一九五六年印度共四大《政治决议》宣称：“共产党将支持政府所采取的反封建地主的每一项措施，支持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措施”，“党将动员农民和我国人民”“来贯彻这些措施”³⁹。印度共领导把国大党政府作为“反封建”的政府来支持，把“反封建”的旗帜交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政权的手中。但到了一九五八年，他们进一步认为“反封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不用再提了。在高士等人看来，“国大党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是在于促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于培植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土地持有者——资本主义的地主和富农的阶级”，土地制度也“越来越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剥削。”⁴⁰他们认为“国大党政府已完成了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因此，反对封建的这个口号已不能再作为全国性农民运动的中心战略口号了。”⁴¹

六十年代以来，丹吉集团明目张胆地贩卖农民利益。他们断言“印度农民和农业工人已经”“从封建的折磨、非法

的封建税收和任意地夺佃中获得解放”⁴²。无耻地吹捧国大党政府制订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划时代的土地改革纲领。”⁴³因此，必须“完全支持这个纲领”⁴⁴。他们搞的所谓全国性“夺地运动”完全是为帮助国大党破坏瓦解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抵消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深远影响。印度共(马)同样是继承并发展了高土时期的路线。它认为国大党政府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大党的土地改革是“要把封建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地主，并且造成一个富农阶层”，使其“成为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主要政治基础”⁴⁵。而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必须“尽可能获得统治阶级的同意”⁴⁶。他们在喀拉拉邦搞的土改和在西孟加拉搞的“和平占地”运动纯属骗人的把戏，都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范围，其目的同样在于破坏农民运动，阻挡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蔓延，并为他们的议会主义路线服务。

印度共不重视农民工作和土地问题的结果是：“独立”前，印度无产阶级没有能实现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削弱了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独立”后，无产阶级没有能够领导农民起来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农村武装革命的道路，把革命的锋芒对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代表它们利益的国大党政权，反而出卖农民，走上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印度农民对国大党的幻想已经破灭，对它的不满已在加深，印度农民是要革命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切切实实地到农村去把广大农民领导起来。

三、对资产阶级没有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

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时，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即须统一，又须独立。”（《毛泽东选集》1968年横排本第721页）印度共实行的却不是这种政策。他们或者混淆民主革命的阶段性、视资产阶级为革命主要对象，因而根本否认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或者在与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过程中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在独立后表面上拒绝与国大党搞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只联合不斗争”，跟着资产阶级后面跑；或者在完全蜕变为修正主义政党后与国大党同流合污，成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御用工具。

早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二大上，罗易就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与列宁相对抗。他认为印度的“社会力量是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工匠、职员、学生、小知识分子等等）组成”，“民族解放运动将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基础上掀起”⁴⁷。因此，他坚决反对与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印度资产阶级也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⁴⁸。罗易这种排斥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于三十年代印度共产党人的思想还继续产生影响。当时印度共一个文件说：“我们党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揭露这些国民大会党“左翼”领袖，并同他们展开“无情的战斗”，因为他们“对于印度革命胜利最有害和最危险”⁴⁹。这种政策的结果不能不使印度共“孤立于”

“具有最大潜在价值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外”。

从一九三五年起，印度共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决定与国大党合作，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在组织上也参加了国大党。但是，印度共在统一战线中却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实行了阶级投降主义。约希集团在二次大战暴发前就宣称，反帝运动不要求“一党一派的排他性的领导，而要求在甘地指导下的统一领导”⁵⁰。认为工农运动必须“从赢得社会同情和国大党的支持出发”⁵¹。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印度共一反过去与国大党的“联合”政策，退出了国大党“左翼”组织，并发动了反国大党领导的运动。约希以“左翼”的面目宣称：“今后的方向，显然是使民族阵线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并压倒和孤立懦弱的资产阶级。”同时，约希集团形“左”实右，以《无产者的道路》为题发表声明，号召进行城乡起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⁵²。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约希集团继续讨好国大党，说“伟大的国大党”是印度共“引以自豪的民族运动的可敬领导”⁵³。印度共幻想成立一个临时的国民政府，而这个政府要“由国大党、伊斯兰教联盟及其他爱国党派的有威信的领袖来加以配备”。⁵⁴而且印度共把在各邦成立的这种政府称做是“孚众望的政府”。⁵⁵二次大战结束前夕，他们又惟恐统一战线破裂，便对甘地和国大党百般颂扬，竟说“国大党是我们的母体，国大党领袖是我们的政治统帅。”⁵⁶约希还特意与甘地进行了一年的通信，约希在信中把甘地奉为印度人“最伟大的爱国组织的最敬爱的领袖”并对他表示“十二分的敬意”。⁵⁷然而国大党并没有理采印度共，一九四五年底就将印度共从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或其他领导岗位上赶走。⁵⁸战后约希等印度

共领导人沿着阶级投降的老路继续滑下去。他们当时的策略方针是建立一条“从尼赫鲁先生到社会党人的联合阵线”。⁵⁹英帝将政权转交给国大党政府后，他们立即宣布“全心全意地热情地拥护它们并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⁶⁰他们还希望尼赫鲁成为“引导印度走上社会主义和富强之路的第一位总理”。⁶¹

印度共在印度“独立”后，按理说应坚持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走农村武装革命的道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在印度的代理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国大党及其政府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是从一九四八年初至一九五〇年中即印度刚取得“独立”的头两年中，印度共兰那地夫集团标榜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织”在一起的理论，把“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规定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消灭资产阶级统治”、“要在政治斗争中公开地击败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⁶²，对农村的富农“要加以彻底消灭”，“要把他们看为资本主义剥削者以及地主的拥护者来与之斗争”⁶³，兰那地夫的“左”倾路线违反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正确方针。

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五月以拉奥为首的中央虽然曾声称要走中国武装斗争道路，要学习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但是实际上拉奥等人早在1948年国大党军队进入海德拉巴邦扑灭武装斗争时，就竭力主张“改变政治路线”停止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⁶⁴，拉奥任总书记后不久，以拉奥为首的新中央就表示对即将到来的印度大选“采取积极态度”⁶⁵并发表《关于大选的决议》“要求立即举行大选”，声称要“以代表民主力量的政府代替现政府”⁶⁶。接替拉奥的高士中

央一上台就和拉奥等人公开出卖农民武装革命，决定“通过谈判解决特仑甘纳武装斗争”⁶⁷，声言在“选举中击败国大党”⁶⁸。他们认为，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只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压迫，不是为了推翻国大党政府”。⁶⁹既然他们用叛卖农民的武装斗争的做法换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府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抽掉了作为统一战线的“支柱”和基础，破坏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在五十年代中期，尼赫鲁政府为了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在政策上特别在外交上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在策略上作些相应的调整，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但是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

（《毛泽东选集》1968年横排本第571页）印度共恰恰是犯了这种错误。高士等人表面上一再宣称，因为国大党是执政党，所以对它不存在统一战线关系，而且“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绝对的独立性及作为政府的一个民主反对党的特点”⁷⁰。但实践上刚好相反。以高士为首的印度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中央会议以后就取消了《新纲领》时期认为尼赫鲁政府是“反动”的论点，认为印度政府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它并非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而是具有“发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可能性”。⁷¹这个政府“发生了根本变化”，它能够走“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印共由原来的“更换政府”的政策改变为要求政府“实行进步的政策”，⁷²即所谓“有条件的支持”的政策。高士等领导人竟声称，“对政府采取的措施加强民族独立和国民经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垄断

资本的每一个步骤，都将得到我们最强有力和毫不吝啬的支持”。⁷³到一九六一年印度共“六大”时，则进一步放弃了“人民民主”的口号，而代之以“民族民主”的口号，用“民族民主阵线”代替了“民主阵线”。⁷⁴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高士等人也经常说与国大党的关系是“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⁷⁵而且强调要与国大党内的“右翼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⁷⁶但是，他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尼赫鲁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决定国大党政府政策的领导集团。他们对国大党的基调是“小批评大帮忙”，实质上是“只联合不斗争”。高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如果不同国大党人联合，不取得他们的支持，我们能够保卫住印度的对外政策，保卫住公营部分，保卫住议会制度吗？”⁷⁷在高士看来，印度资产阶级还没有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仔买办资产阶级。高士早在一九五一年时就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名词的意义是指我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大小）”⁷⁸，“他认为国大党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包括它的右派在内”⁷⁹，而尼赫鲁则是“国大党内一个最有远见和最明智的领袖”⁸⁰。

印度共除几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外，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约希时期和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高士时期两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推行一条追随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印度共（马）继承并发展了高士时期的路线。它认为印度大资产阶级是与外国垄断资本妥协和勾结的“工业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官仔买办资产阶级”，印度政府是“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⁸¹他们表面上与国大党政府矛盾重重，口头也说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略,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该党在掌握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两邦政权时,同联邦政府互相勾结,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与大财阀比尔拉大搞阶级合作,只是在大选时,特别是他们的“联合阵线政府”被英、甘地解散时,才发表声明“激烈地”批评政府。叛徒丹吉集团则是公开露骨地与国大党政府合作,它“七大”文件宣称,国大党政府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党的目标是建立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⁸²。十年来,丹吉集团全心全意地维护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专政,无条件地支持国大党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他们对国大党反动政府极尽吹捧之能事,称英·甘地是“印度人民的杰出领袖”。他们热衷于议会选举,同国大党“结成联盟”,同政府搞“共同行动”。两个修党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两个仆从和走卒。

总之,印度共没有实行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没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自主政策。“独立”前,没有区别两类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买办资产阶级,有时恰恰相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也对大资产阶级实行投降。对资产阶级只有联合没有斗争,结果使反英的领导权落在资产阶级手中,甚至被资产阶级右派所占夺。“独立”后,仍旧混淆两类资产阶级,应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而不去联合,应当同大资产阶级决裂而不敢决裂,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大党政府,从妥协、投降到互相勾结(如丹吉),完全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归根结底,如果不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并为建立领导权而努力,印度革命是起来不了的。

注:

1. 山卡尔·高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印度》第四章印度1971年版。
- 2.3. 马·纳·罗易:《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1927年)引自奥佛斯特里特等著:《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4页。
- 4.5. 《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30年引自美国太平洋学会编:《印度共产党文件》(1930年——1956年)。
6. 《党内通讯》Ⅱ(1942年4月6日)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7. 米德拉编:《1943年印度年鉴》Ⅰ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218页。
- 8.9. 《兰那地夫关于改良主义偏向的报告》1942年。
10. 约希:《论帝国主义对我党发动的新攻势》1947年3月
11. 《国民先驱报》(1946年3月9日)引自山卡尔·高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印度》第八章。
12. 印度共政治局文件:《论人民民主》1949年。
13. 《印度共产党纲领》(1951年10月)。
14. 高士:《印度共产党当前的任务》(1953年12月)《印度共三大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5. 高士:《新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1年10月)《印度共六大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
16. 高士:《共产党为争取和平、自由与民主而斗争》(1955年6月)。

17. 高士：《新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1年10月）
《印度共六大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
- 18.19. 《印度共中央委员会向四大的报告》（1956年
4月）《印度共四大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 丹吉、约希、阿迪卡利：《印度共产党纲领草案》
（1961年）《印度共六大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
21. 《印度（马）七大纲领》1964年10月
22. 《新世纪》周刊1973年4月5日
23. 《人民民主》周报1974年1年13日
24. 《人民民主》周刊1973年12月2日
35.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引自《对印度共产党历史
的新评价》《解放》月刊1968年2月号
39. 《对印度共产党历史的评价》《解放》月刊1968年
2月号
27. 《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30年）引自美国
太平洋学会编《印度共产党文件》（1930年至56
年）1957年版。
29. 《关于在保卫祖国与争取建立国民政府的行动中团
结起来的决议》（1943年5月印度共一大通过）
30. 《党内通讯》（1943年10月4日）引自《兰那地夫
关于改良主义偏向的报告》
31. 约希：《论帝国主义对我党发动的新攻势》（1947
年3月6日）
32. 印度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蒙巴顿方案及其提出以
后》（1946年7月）
33. 《安德拉省委论特仑甘纳运动》（1950年10月）
34. 印度共中央政治局：《论印度土地问题》（1949年

3月)

35.36. 同33

37. 《关于印度共产党内左倾偏向的报告》(1950年5月)《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与印度共产党》(1950年11月)

38. 《关于大选的决议》(1950年12月)

39. 《印度共四大政治决议》(1956年4月)引自《印度共四大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40.41. 印度共全国委员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若干方面的决议》(1958年10月)

42. 《印度共产党“七大”纲领草案》(1964年)

43. 《印度土地问题和中国领导》《新世纪》1964年5月

44. 莫希特·森:《答读者问》《新世纪》1963年12月15日

45. 印度共(马)“七大”纲领

46. 《中央委员会关于某些农业问题的决议》《人民民主》周刊1973年3月25日

47. 罗易:《印度政治的未来》(1926年)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83页

48. 马·纳·罗易:《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1927年)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3—104页

49. 《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30年)引自美国太平洋学会编:《印度共产党文件》(1930年至56年)

50. 《民族阵线》1939年3月19日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6页

51. 《新世纪》周报1939年5月引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第170页
52.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81——182页
53. 同上第212页
54. 《为实现国大党——伊斯兰教联盟协定而努力》
(1942年11月)
55. 《兰那地夫关于改良主义偏向的报告》(1948年)
56. 约希:《国大党与共产党》(1944年)引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第220页
57.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220页
58. 同上第222页
59. 《人民世纪》1947年10月19日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第326页
60. 约希:《旁遮普运动》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326页
61. 《人民世纪》1947年11月9日引自《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第327页
62. 印度共政治局文件:《论人民民主》(1949年1月)
63. 《关于安德拉省委书记处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48年7月)
64. 拉·拉奥:《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仑甘纳斗争及其丰富经验中吸取教训》《新世纪》周刊1972年9月10日
65. 印度共中央《印度人民民主革命与印度共产党》
(1950年11月)
66. 《印度共中央关于大选的决议》(1950年12月)
67. 《关于通过谈判解决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决议》

(1951年10月)

68. 《关于停止特仑甘纳地区游击队活动的声明》1951年10月
69. 同67
70. 《印度共四大报告》《印度共四大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71. 《印度共产党纲领修正案》(1955年9月)
72. 高士:《论印度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1955年7月)
73. 《印度共四大政治决议》《印度共四大文件选辑》
74. 《印度共六大报告》《印度共六大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64页
75. 同70
- 76.77. 同74
78. 高士:《论我们的纲领》(1951年)
79. 同64
80. 高士:《共产主义争取和平、自由与民主而斗争》(1955年6月)
81.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在某些基本纲领和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分歧》(1967年8月18—21日)
《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76年10月21日
82. 丹吉集团七大文件

(写于1974年)